

「自我」的符碼與戲碼

——論瞿秋白筆下「多餘的人」與〈多餘的話〉

陳相因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然而「我」，——是歐華文化衝突的犧牲，「內的不協調」，現實與浪漫相敵，於是「社會的無助」更斷喪「我」的元氣，我竟成「多餘的人」呵！

〈中國之「多餘的人」〉(1921)¹

可笑的很，我做過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的領袖（？），可是，我卻是一個最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殺一隻老鼠都不會的，不取的。

〈多餘的話〉(1935)²

一、幕前幕後

若將上述兩段瞿秋白生涯早期認為自己乃中國之「多餘的人」，以及晚期〈多餘的話〉裏的文字，與圖一以及圖二至圖四並列參照，在閱讀上極易產生衝突感。圖一意圖將瞿的形象塑造為共黨先鋒：在波濤洶湧中，瞿緊握右拳，蹙眉象徵在困苦環境裏先天下而憂的奮鬥。身著大衣，隨風飄起的領帶，站立於碎裂而洶湧的浪濤之中，試圖建立起共黨英雄「乘風破浪，屹立不搖」的形象。除此畫像外，圖二至圖四，藉由中共在黨、政、軍三方高層代表宋慶齡、陳丕顯和宋仁窮所題，欲將畫像所建構的瞿秋白形象以「名人推薦」的文字方式深植人心，以他人為瞿作嫁。共黨刻意建構的影像文字和瞿先後自敘的認同

¹ 瞿秋白：〈中國之「多餘的人」〉，《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頁219-220。本篇論文多採用此版本，他版則另註。

² 瞿秋白：〈多餘的話〉，《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頁714。



圖一

希望小朋友們學習瞿秋白
烈士和其他革命先烈的忠
實於人民的革命精神。
好好學習，好好勞動，以增
自己的知識，提高社會主義
覺悟，長大了為黨為祖國
貢獻最大的力量，做個
的好兒女。
宋任窮
1959-6-15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小學——常州學區瞿秋白小學

圖二

學習
宋任窮
一九五九年六月

圖三

秋白精神與
日月同輝
陳在顯
一九九三年
二月

圖四

相較，差異不啻天壤。

瞿秋白，一位在俄羅斯仍處於國內紅、白軍戰爭時期，就已抵達莫斯科學習的中國知識青年，所謂舊制度的紳士階級菁英，卻自述為「多餘的人」。這曾位居要津的中共領袖，不僅在第一次國共合作與分裂的歷史中扮演著要角，更是一九二〇年代往來於共產國際與蘇聯高層之間的風雲政治人物，卻在行將就木之際寫下了〈多餘的話〉。在尋求「自我」的過程中，瞿秋白對於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與社會中「多餘的人」的主軸，從認同、疏離 (alienation)、否定、嘲弄，臨終前又回到看似原點的情感，巨大的轉變，導致各種猜想與懷疑接踵而來，復以中國共產黨從瞿被俘「就義」/「正法」後，官方的態度與解釋隨著歷史發展產生毀譽參半的現象。細閱過往中國大陸對瞿評價的文獻，不少人難免對現有史料與文本交叉影響下所建構出瞿的形象、心態與認同產生強烈質疑。

目前大陸學者對瞿秋白的研究，若以具代表性的期刊《瞿秋白研究》和出版專書為例說明，可歸納為下列數種。其一，身世、生平與族譜的考證³，再次，為瞿立傳與整理年譜⁴，或是細數瞿與同時代中、俄要人之間的友誼與交

³ 瞿獨伊：〈尋覓雙親的足跡〉，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輯（常州：瞿秋白紀念館，1989年），頁362-379；吳之光：〈瞿母之死因及其它——瞿秋白家世探討之二——〉，同上書，頁401-408；吳之光：〈常州瞿氏世系源流考〉，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2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0年），頁321-330；錢聽濤：〈瞿秋白入黨時間考析〉，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4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年），頁243-248。

⁴ 陳鐵健：《瞿秋白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與《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周永祥：《瞿秋白年譜新編》（上海：學林出版社，

往情形⁵，或有勘探瞿的思想與俄國文學文化的關係⁶，或者暢談瞿之影響⁷，抑或說明其政治思想。最耐人尋味的，還有一些屬於建構「黨國英雄」的公式化論文與專書，堆疊在意識形態下的集體頌詞數量蔚為可觀⁸，彷彿是為平衡

1992年)；韓斌生：《文人瞿秋白》(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劉福勤：《瞿秋白：情感·才華·心史》(濟南：濟南出版社，2001年)。

⁵ 葉孟魁：〈瞿秋白與張太雷〉，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輯，頁302-318；韓斌生：〈瞿秋白與陳獨秀〉，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2輯，頁114-126；吳騰鳳：〈共同的志向深厚的友誼——瞿秋白與蔣光慈的友情概述〉，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2輯，頁331-338；邵玉健：〈瞿秋白與常州名人考略〉，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2輯，頁339-353；季甄馥：〈瞿秋白與普列漢諾夫〉，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3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年)，頁95-123；劉小中：〈瞿秋白和郭沫若的交往和友誼〉，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7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年)，頁172-179。專書方面可參閱孫叔、湯淑敏主編：《瞿秋白與他的同時代人》(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⁶ 汪誠意：〈瞿秋白的思想演變與俄蘇文學〉，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輯，頁236；王關興：〈瞿秋白和第三國際〉，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2輯，頁19-42；周永祥：〈瞿秋白與中蘇文化〉，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2輯，頁64-84。

⁷ 于良華：〈瞿秋白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和傳播〉，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輯，頁126-137；葉楠：〈瞿秋白對語言理論的貢獻〉，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2輯，頁173-182；曾樂山：〈瞿秋白在哲學上的傑出貢獻〉，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3輯，頁55-75。在專書方面，張秋實的《瞿秋白與共產國際》(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整理不少中俄交流關係方面的史料，但直述多而分析少。

⁸ 此類型的論文範例不勝枚舉。據筆者統計，從一九八九至二〇〇五年幾乎每期《瞿秋白研究》裏都會出現一篇以上。但從論文的用字遣詞與頌詞出現的頻率來看，有逐年趨緩減少的趨勢。朱淨之：〈中國新文化的一胚胎——瞿秋白的社會史觀〉，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輯，頁138-154；潘涵英：〈請鄧小平同志題寫「瞿秋白紀念館」〉，同上書，頁412-414；陳弼：〈秋白同志，我們永遠懷念您〉，同上書，頁414-416；劉自省：〈瞿秋白同志嚴以律己的自我解剖精神〉，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2輯，頁289-301；溫濟澤：〈我怎樣研究起瞿秋白〉，同上書，頁363-367；趙庚林：〈秋白精神與紀念文化〉，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3輯，頁269-277。在研究專書方面，史洪所著的《革命先驅瞿秋白》(北京：中國勞動出版社，1990年)，著實將瞿秋白塑造成為共黨「先鋒英雄」。在兒童、青少年讀物方面，則有江蘇省瞿秋白研究會、中共常州市委宣傳部、常州瞿秋白、張太雷、惲代英研究會與江南大學瞿秋白研究中心共同主編：《瞿秋白》(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5年)；江蘇省瞿秋白研究會、中國少年先鋒部隊江蘇省工作委員會編：《偉人瞿秋白》(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兩書皆以圖文方式來塑造瞿秋白的偉人形象。在大眾傳播方面，常州電臺製作了在瞿秋白百年誕辰製作了六集系列廣播劇，名為《永久的青年——瞿秋白》(常州，1999年)，故事內容仍不離這套公式，也獲當年全中國廣播劇一等獎。由此可見，近二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對於如何在歷史中詮釋瞿秋白，並建構人民對黨高層的意識形態，是相當注重且多方面的控制。

文化大革命中《討瞿戰報》對瞿所做的集體批判與辱罵，當成一種賠償與補償。這讓熟習瞿文章的讀者難免想起在〈多餘的話〉中，他留給後世的「遺言」或「警訊」，起首一句：「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⁹，不但照見其先見之明，亦使後世的臆測、想像與評論間的矛盾與衝突更具戲劇性。

儘管有些英美、蘇聯與日本，甚至是臺港的研究者亦探索瞿秋白在中國，特別是左翼文學、思潮等方面的影響，但與上述中國大陸的研究動機、方法與成果有所不同。歐美研究聚焦更多的並非身世或生平的考證史料，而是呈現瞿秋白個人的內在思想與外在歷史、社會和政治的結構交互作用後，文本如何再現 (representation) 與演變¹⁰。中國大陸研究與他國研究最大相異點在於慣與官方論述共謀，堆砌出時代集體意識所能接受的瞿秋白形象、心態與認同，這些論述通常建構出瞿秋白的革命浪漫情懷與理想面。然而，歐美研究者卻意圖以瞿時代中各項生活細節的資料對照文本，收集時代背景資料，緊密地連結瞿秋白的個人需求、性格與命運，著重還原瞿秋白的政治活動與現實面，反駁中國共黨官方強大的集體意識論述。

研究瞿秋白的重要之處在於，從他一九二一年八月第一次赴俄到一九三五年被國民黨槍殺的這段期間，由中國政治角度來看，國共經歷第一次合作與清 / 分黨；國際政治上，國民黨由蘇聯路線轉為親向美、日；從中共黨史視角出發，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一路聲勢浩大到四處八方竄逃；或以共產國際演變審視，前蘇聯由列寧的國際主義 (internationalism) 轉向史達林的國家主義 (nationalism)。在這些重大事件舞臺背後的權力交換、鬥爭與更迭，曾扮演仲介 (翻譯、私人秘書等職務)、國共兩黨合作的上海大學教授、國共兩黨委員、中共領導人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瞿秋白，都曾涉身居中，抑或身陷其中。最有趣的是，瞿在這期間遊走於政壇與文壇之間，仕途得意時文章盡露新潮激進的政論家鋒芒，失勢時字裏行間少不了中、俄傳統作家懷才不遇的牢騷諷刺與自憐自艾。不同時期的文字展演了他的多重身分。由此看來，無論是專職或身兼數職的瞿秋白，在上述不同的政治舞臺上扮演多種角色——從力爭登臺，

⁹ 瞿秋白：〈多餘的話〉，頁 694。

¹⁰ 參閱 Tsi-an Hsia (夏濟安), "Ch'ü Ch'iu-po: The Making and Destruction of a Tenderhearted Communist,"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8), pp. 3-54; Paul G. Pickowicz,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上臺賣命到被逼下臺；從跑龍套，當配角，晉主角到被換角——這當中瞿秋白戲份吃重也做足了戲，豈能不如他最後遺言：「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不管全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感覺到十年二十年沒有睡覺似的疲勞，現在可以得到永久的『偉大的』可愛的睡眠了。」¹¹

本文論述聚焦於中國與中共內外的「政治舞臺」，鎂光燈照在自述上臺演著「滑稽劇」¹²的「戲子」¹³瞿秋白，是如何在臺前、臺上和下臺後以文學創作方式展演內心「真正的自我」？深愛昆劇與傳統戲曲的瞿秋白不可能不明白，在臺上「戲子」的身體不只成為被他人操弄的工具，更要被眾人觀看的這層道理。如果瞿自己這樣的比喻暗示著自己在政治的舞臺上走不出傀儡演員的命運，那麼他正以文學的手法扮演另一個自己，在自選、自編、自導、自演的文學舞臺上和另一個任人擺布和宰割的政治舞臺戲子打擂臺。本文論證瞿秋白如何認同與繼承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多餘的人」的傳統，做為自己在文壇與政壇的起點，最終又是如何在自己一個人的文學舞臺上寫下〈多餘的話〉，用以結束另一個自己處在「千萬人吾往矣」舞臺上的政治生命。

下文可詳見，瞿秋白如何以中、俄之「多餘的人」為其一生創作的一個重要發展主軸，將「自我」置入這一符碼系統，在最後〈多餘的話〉中展演一個豐富而多層次的戲碼。倘若缺乏綜觀且橫向細析此主軸在瞿生命各階段的演變，則無法較為全面地解開〈多餘的話〉的密碼。

二、登臺前的文學預演：遺／戰書〈自殺〉、自白書《餓鄉紀程》與自新

從一八九五年改良運動至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階級，必得經歷外在劇烈的結構轉變。正如學者傅斯(Charlotte Furth)所論，傳統科舉制度已然廢止，學校制度取而代之，導致傳統仕途的工作機會消蝕，知識分子工作的迅速專業化、專門化。這一世代的文人為求溫飽，一方面注意各種報刊以取得新式的溝通與聯繫方式，一方面得選擇參與各種類型的學會、社

¹¹ 瞿秋白：〈多餘的話〉，頁720-721。

¹² 同前註，頁715-721。

¹³ 同前註。

團與政治性黨派。她續而指出，深受變動時代影響的知識分子階級正在發展一種全新的凝聚力，同時也受脅於中國社會一般大眾對於新一代知識分子相對而生的疏離感。教育的目的已經不再只爲了當官，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被摒棄於政治權力主流之外。同時，也有越來越多文人甘冒失去大眾溝通橋樑，即喪失自己所傳承的語言與文化的風險，全面接受外國模式的教育¹⁴。

除了上述外在結構的劇變，從改良運動到五四運動成長的這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爲因應外在的知識溝通和資訊交換快速地流變，個人內心產生多重力量雜處的混沌狀態。一八九八至一九一九年這段期間，中外各種學說紛然雜陳。知識分子結黨、結社，各文學團體間對多項問題時有爭論或筆戰，例如改良主義者與激進主義者在辛亥革命前的激烈辯論等¹⁵。即便是在同一大團體裏，個人與個人的意見分歧亦時有所見，如新傳統主義、激進主義與新文化運動等團體裏，還細分許多流派¹⁶。這些團體、派系與個人意見相異時，爭執不休，砲火對外，力量單薄時，則尋求和解合作。此外，處在「新」、「舊」社會裏，傳統與外來文化相互激盪，團體與個人的思想認知相互爭鬥妥協，加上外在與內在演變的過程，不難想見，瞿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內心狀態在不同時期產生了多種中外的文藝和政治力量拉扯。若將個人的生命史與黨國敘事以線性發展的方式相互檢核，個人展現的「知」與「行」時常不一，甚至呈現出多重形象身分自相矛盾的精神現象。自我認同如何認定、演變和再現，都是本文關注與研究的重點。

瞿秋白生於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正逢改良運動到五四運動期間。青少年時期的瞿秋白不但接受中國傳統儒學薰陶，更深入研究老莊哲學與佛學經典¹⁷。一九一七年瞿考取北京政府俄文專修館，開始接觸俄語與十九世紀俄國

¹⁴ Charlotte Furth, "Intellectual Change: from the Reform Movement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1895-192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ed. J. K. Fairbank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XII, pp. 322-323.

¹⁵ 各文學團體間辯論要點與分歧意見，還有筆戰衝突的事件，可參考 Furth, pp. 354-361, 374-377。

¹⁶ 新傳統主義從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間共出現了三個流派，分別爲國粹派、梁啟超的國性派和孔教派。激進主義者內又分爲早期的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烏托邦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幾種派別。同倡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胡適與陳獨秀，又分屬於兩大不同陣營，一爲自由主義，一爲共產主義。見 Fairbank and Twitchett, XII, pp. 322-451。

¹⁷ 五四運動以前，瞿秋白所受的教育，還有閱讀與研究的書籍與書目，可參閱他的自述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一卷，頁 3-39。本書

文學。運動期間，他成為俄文專修館學生會的代表，積極參與演講、宣傳、翻譯與創作。過後，瞿秋白的思想有了顯著的改變。一九二〇年三月加入李大釗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¹⁸，次年八月前往新俄，一九二三年一月回中國。加入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學說等元素後，瞿秋白的思想體系與意識形態更為複雜，使得瞿在建構自我的形象、認同、心態與行為時，所產生的增強、矛盾、鬥爭、協商與融合等精神現象更顯錯綜。瞿個人的學思背景、閱讀史、思想演變、性格命運與著作翻譯，體現了五四一代文人共同經歷的時代、記憶與歷史糾葛，同時這些也一一銘刻在他的文本論述裏。

(一)、佛、道、儒家、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糾結

1. 家庭生活：紳士意識與道家名士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¹⁹

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著表面不容易覺察罷——其實是始終沒脫掉的。

～〈多餘的話〉(1935)²⁰

《餓鄉紀程》的開頭敘述，以及近來多數學者考證俱皆指出，瞿秋白生在江蘇省常州府城一個「世代讀書，世代做官」的大戶人家，鼎盛時期號稱「瞿半城」²¹。辛亥革命後，時代激變而家道中落，依瞿的敘述，「破產的『士的階

於一九二二年九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時，經作者友人改名為《新俄國游記》(副題為《從中國到俄國的記程》)，是「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還有鄭振鐸的回憶文章〈記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鄭振鐸全集》(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2冊，頁630。

¹⁸ 瞿秋白形容，就此會的研究內容而言，可算是「俄羅斯研究會」，見瞿秋白：〈多餘的話〉，頁696。

¹⁹ 瞿秋白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日寫給魯迅的信中，描述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封建制度崩壞的特點時，引用了劉禹錫〈烏衣巷〉裏兩句「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強烈暗示自己的出身與處境，見瞿秋白：〈關於整理中國文學史的問題〉，《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頁76。

²⁰ 瞿秋白：〈多餘的話〉，頁701。

²¹ 關於瞿秋白的家庭身世可參考其自述。參閱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頁3-37。亦有不少學者考證研究，如 Hsia, pp. 9-12。中文資料可參閱司馬璐：《瞿秋白傳》(香港：自聯出版社，1962年)，頁1-10；陳鐵健：《瞿秋白傳》，頁1-23；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9-32；吳之光：〈常州瞿氏世系源流考〉，頁321-326；張秋實：《瞿秋白與共產國際》，頁2-9。

級』大半生活築在債臺上，又得保持舊的『體面』²²，讓青少年時期的瞿秋白已經飽受人情冷暖。後來在與他交好的幾位同世代文人裏顯得十分「少年老成」²³。瞿這樣敘述：

我的誕生地，就在這顛危簸盪社會組織中破產的「士的階級」之一家族裏。這種最畸形的社會地位，瀕於破產死滅的一種病的狀態，絕對和我心靈的「內的要求」相矛盾。於是痛，苦，愁，慘，與我生以俱來。我家因社會地位的根本動搖，隨著時代的潮流，真正的破產了。「窮」不是偶然的，雖然因家族制的維繫，親戚相維持，也只如萬丈波濤中的破船，其中名說是同舟共濟的人，僅能有牽衣悲泣的哀情，抱頭痛哭的下策，誰救得誰呢？²⁴

瞿秋白早年曾研究國學，嚮慕道家的「性靈」²⁵和「名士化」²⁶，是其「內的要求」之一。面臨經濟困窘又得保持「舊體面」與日後加入共產黨，一再強調的「工農」與「無產」階級意識產生了矛盾，這正是建立起二元模式的行為與心理狀態一個遠因。

一些學者進而考證，說明瞿秋白的親祖父瞿廷儀一生並不得志，加上父親瞿世瑋終身未仕且遊手好閒，一家三代僅能托庇於叔伯門下²⁷。因此，當世家社會與經濟地位崩潰之時，瞿秋白這一直系血脈輾轉遷居於祖祠與親戚家中，最能體會寄人籬下的心境²⁸。士階級的破產則讓他更能明白，大家族間爭奪僅剩家產的情況：

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經濟利益的衝突，家庭維繫——夫妻情愛關係——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覷戴著孔教的假

²² 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頁 17。

²³ 五四運動前後與瞿秋白交好之友，包括鄭振鐸、許地山、耿濟之、瞿世英等人，年紀雖都比瞿秋白稍長，卻給了瞿秋白這樣的稱號。參閱鄭振鐸：〈記瞿秋白同志的二三事〉，頁 629-630。

²⁴ 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頁 14。

²⁵ 同前註，頁 24。

²⁶ 同前註。

²⁷ 夏濟安的考證小有疏失，指「瞿秋白的祖父在滿清時代擔任高官」，見 Hsia, p. 9。事實上，瞿秋白的祖父瞿廷儀官運並不亨通，一輩子在其弟瞿廷少（曾任湖北布政使）麾下擔任幕僚，詳見吳之光：〈常州瞿氏世系源流考〉與張秋實：《瞿秋白與共產國際》的研究。

²⁸ 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頁 25。

面具，背地裏嫉恨怨悱詛咒毒害，無所不至。²⁹

在此同時，瞿秋白的母親也因婆婆去世與丈夫離鄉，飽受親戚間流言中傷之苦，說她「把丈夫逼走，把祖母搬死」。家庭飢貧，債主時常登門催討，為使子女前途不受波及，一九一五年二月間她竟憤而「吃虎骨酒和紅磷火柴頭灰」自盡³⁰。瞿在《餓鄉紀程》多處提及，後又經常對親朋好友與黨員說起，足見他母親金衡玉自殺的命運與自我犧牲的想法對瞿秋白一生有著重要影響³¹。據楊之華回憶，每每瞿秋白提及此事時，「就沈默很久，回憶當時情景：『親到貧時不算親，藍衫添得淚痕新，此時飢寒無人管，落得靈前愛子身。』母親死後，他陪靈半年，稀粥難嚥，孤苦極了」³²。這一事件不僅說明瞿一家當年在經濟與家庭方面的窘境，更使身為長子的他得面對營生的問題，到無錫的窮鄉僻壤當一國民學校校長，開展了他所謂「唯心」的「避世觀」³³。我們可以發現，「體面」的「名士」與「避世」，通常亦是瞿秋白日後面對自身困境一開始所展現的一種哲學態度與行為的因應模式。然而，選擇這一態度後緊接而來的常是激烈的反彈，並逐漸走向「厭世」、「佛教人間化」與「革命」等另一極端。

2. 北京求學：佛教人間化

除了將母親的自盡歸咎於大家族的敗落貧困，瞿秋白把土的破產原因起於當時中國社會列強入侵與軍閥割據的狀況。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並未為中國帶來希望，這也是瞿秋白後來為何選擇投入宣稱願意放棄在華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新俄與共產國際，並且在一九二六年違逆陳獨秀而贊成揮軍北伐的原因之一。據瞿自陳，在一九一〇年代末期北京求學的階段裏，「新官僚『民國』的生活」讓其轉為「厭世觀」。儘管如此，卻仍「漸漸的心靈現象起了變化」³⁴。這階段瞿潛心佛學，發願為佛教人間化而實現菩薩行。丁玲回憶瞿秋白時曾清楚點

²⁹ 同前註，頁 14-15。

³⁰ 瞿秋白對楊之華敘述他的家庭身世，參閱楊之華：〈憶秋白〉，收入瞿秋白：《瞿秋白自傳》（淮陰：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頁 206，以及楊之華、洪久成整理：《回憶秋白》（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以及周永祥：《瞿秋白年譜新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年），頁 19。

³¹ 參閱 Tsi-an Hsia, “Ch’ü Ch’iu-po” 與陳鐵健：《瞿秋白傳》。

³² 楊之華、洪久成整理：《回憶秋白》，頁 15。

³³ 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頁 24。

³⁴ 同前註，頁 25。

明，一九二九年她所寫的中篇小說〈韋護〉，男主角便是以他的生活為原型 (archetype) 做為靈感來源³⁵。取名為韋護，除了因為他曾以「屈維陀」為筆名，還曾對她說過，韋護是韋陀菩薩的名字，「他最是疾惡如仇，他看見人間的許多不平就要生氣，就要下凡去懲罰壞人。」³⁶正是描繪瞿從入北京開始到五四運動之間共三年的這段時期，從「厭世觀」轉為入世的心願，而這一「空願」將在五四運動過後壓倒了原本道家的「避世觀」與「厭世觀」哲學。

加里克 (Marian Galik, 1933-) 與畢克偉 (Paul G. Pickowicz) 則指出，此期的瞿秋白可能僅對佛教思想體系下的唯心意識感到興趣，因為這一意識假設客觀世界裏萬物皆為虛幻，僅存在於感受者心智中的假設，正符合他的心理需求³⁷。這一解釋，如加高氏與畢氏所指，可與瞿在一九三五年長汀獄中幾首題詞的「廿載浮沈萬事空」³⁸、「眼底雲煙過盡時」³⁹、「心持半偈萬緣空」⁴⁰等等字句相互印證。然而，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年輕的瞿秋白在第一次前往新俄前的厭世觀，相較於最後壯年時被國民黨擒獲入獄時表現出的佛家心境，是不盡相同的。至少，瞿在此時並不感到自己命懸一線，將走到人生盡頭。而此時所謂的「厭世觀」，乃是如他所云，基於對民國社會諸多不公現象的不滿而引起：紳士階級尚且為「飯碗問題」⁴¹勞心，何況一般普羅大眾。

五四前後，瞿秋白自比「韋陀」，是年輕人自信的抱負，嚮慕「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慈悲理想。所以往新俄走去，並非「為生乃是為死而走」⁴²。綜觀五四時期到第一次赴俄之間的全部創作，下文亦可詳見，青年瞿秋白更感興趣的是於大乘佛教，意在度人的積極面，而非小乘佛教僅求自度的消極面；更傾向於接受佛儒交雜的入世觀，而非佛道兩者交集的避世觀。儘管如此，佛教思想的積極 / 消極、救世 / 厭世，一體兩面，加上道家的避世和儒家的入

³⁵ 丁玲：〈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丁玲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冊，頁48-50。

³⁶ 同前註，頁48。

³⁷ Marian Galik, "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II. Young Ch'ü Ch'iu-pai (1915-1922),"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2 (1976): 90-95; Pickowicz, p. 10.

³⁸ 瞿秋白：〈浣溪沙·瞿秋白獄中詩詞和題詞〉，收入劉福勤：《從天香樓到羅漢嶺——瞿秋白綜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310。

³⁹ 瞿秋白：〈卜算子〉，收入同前註，頁310。

⁴⁰ 瞿秋白：〈偶成（集唐人句）〉，收入同前註，頁311。

⁴¹ 瞿秋白：〈多餘的話〉，頁695。

⁴² 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頁17。

世，看似互相矛盾，但實際上卻又相互糾纏、如影隨形。迨瞿臨終前回首一生，繁華落盡，嗟嘆一事無成時，自然又從積極地救世與入世的一端擺盪至消極地避世與厭世的另一端，方使〈多餘的話〉一文充斥著二律背反 (antinomy) 的精神現象與文學主題「多餘的人」的美學。

3. 五四運動時期：俄國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加入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對瞿秋白一生與後來如何從接受俄羅斯無政府主義到共產主義的發展而言，是一個至關緊要的里程碑。如他自我表陳，是成為「脆弱的二元人物」的初始和轉捩階段。運動開始時，瞿時為俄文專修館的總代表，開始一連串學運活動。十一月初又接受北京基督教青年會 (YMCA) 的資助，同瞿菊農、鄭振鐸、耿濟之等人以北京社會實進社名義創辦《新社會》旬刊。該刊開始介紹青年修養、科學知識，後來轉向鼓吹社會改造、家庭革命，抨擊時政，討論社會主義。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間瞿秋白在該刊物以及其他報刊上發表了多篇文章與譯作⁴³。文章幾乎全是批判舊社會、舊思想與統治階級，而譯作不少是十九世紀俄羅斯名作家的作品，像是托爾斯泰的〈閒談〉⁴⁴與〈祈禱〉⁴⁵，果戈理的劇作《僕御室》(Лакейская, 1838)⁴⁶與散文〈婦女〉⁴⁷等等。畢克偉認為，這時期瞿秋白的信念是難以分析的，因為他猛烈地抨擊與破除舊社會，同時又受佛教影響；儘管對西方強國深具敵意，同時卻又受到其自由意識形態的吸引，故將此時的瞿歸類為「羽翼漸豐的社會主義者」(a fledgling socialist)⁴⁸。然而，這一劃分並不够精確。據瞿秋白在〈多餘的話〉裏所做的自我剖析，這段時期在他思想中所形成的，「與其說是革命思想，無寧說是厭世主義的理智化」。更確切而言，他是一個「近於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主義者」⁴⁹。

前已清楚地分析了瞿秋白「理智化」的「厭世主義」，值得我們更深入探

⁴³ 周永祥：《瞿秋白年譜新編》，頁 28-38。

⁴⁴ 發表於《新中國》第一卷第五期（1919年9月15日）。

⁴⁵ 發表於《新中國》第二卷第三期（1920年3月15日）。

⁴⁶ 發表於《曙光》第一卷第四期（1920年2月）。

⁴⁷ 發表於《婦女評論》第二卷第三期（1920年11月1日）。

⁴⁸ Pickowicz, p. 22.

⁴⁹ 瞿秋白：〈多餘的話〉，頁 695-696。

討的是瞿接近於托爾斯泰無政府主義的自我認同。瞿說自己當時不是一個「政治動物」⁵⁰，他認知的托爾斯泰主義更非關東正教天啓的影響，而是一種生活態度與哲學，以反求諸己為基礎的和平主張來反對舊社會，但並非另持主張去創造新社會，更非利用暗殺或革命式的流血衝突。最有趣的是，一如晚年的托爾斯泰，瞿同時在這種和平主張的思想中融合了黃老的「無為」⁵¹與佛家「無我」⁵²的觀念。之後在《赤都心史》中，瞿秋白客觀地記述了他參觀托爾斯泰的宅邸與公社的見聞與觀感。一個半月後，他寫下了〈我〉一文，自陳自我並非「舊時代之孝子順孫，而是『新時代』的活潑稚兒」。他在此文中延續了托爾斯泰的主張，更進一步地描繪了心中認同的新時代理想國，那是個「無社會與世界，無交融洽作的，集體而又完整的社會與世界，更無所謂的『我』，無所謂民族，無所謂文化。」⁵³

儘管如此，五四時的瞿秋白卻正處於血氣方剛的年紀，對內在「無為」和「無我」的認知，以及外在反帝國主義兼反軍閥的行為產生了巨大的反差，而這落差又在他隨後的反省敘述呈現一種紛亂、矛盾、消極而不穩定的失落感。瞿秋白在五四運動開始便熱烈參與各項愛國活動，像是演講和宣傳反帝國主義思想，以及請願與創辦刊物等。過程中，瞿的表現時而冷靜老成，時而慷慨激昂。當北大學生林德揚因對現實社會不滿，憤而投水自殺引起社會輿論強烈的反響與討論時，瞿秋白便在《晨報》上發文評論，要求青年人不要自殺，要「深

⁵⁰ 同前註，頁 696。

⁵¹ 托爾斯泰哲學與老子《道德經》思想，以及兩位作家之間的文哲關係已為一些中、俄、日三國文評家注意或探討，例如可參閱戈寶權：《中外文學因緣——戈寶權比較文學論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頁 105。Кондрашова Л. И., Суворцева М. Е.,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в России: Лев Толстой и Лао-цзы,” *Пятое Торчин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 Философия, религ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стран Востока 6-9 февраля 2008г.* (СПбГ: СПбГУ, 2009), С. 485-491; Нобуюки Накамото (中本信幸), “Толстой и Лао-Цзы: Преемники идей Л. Н. Толстого в Японии,” *Печатный Двор 2001-2010.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ДВО РАН, 2012), С.144-151。瞿秋白於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八日遊歷托爾斯泰宅邸時，在托翁書架上發現了漢英對照的《道德經》一書，詳見瞿秋白：《赤都心史》，頁 188。此書現仍放置在托翁宅邸書架上。

⁵² 托爾斯泰哲學的佛教思想，尤以「無我」的概念在其晚年哲學著作《生活之路》（*Путь жизни*）中表達得十分明確。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可參閱 Давид Квитко, *Философия Толстого* (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1928), С. 47-51.

⁵³ 瞿秋白：《赤都心史》，頁 213。

信社會的確可以改良」，鼓勵青年「不要存著憤嫉的心，固執的空想，要細心去觀察社會的病源。我們於熱烈的感情以外，還要有沉靜的研究。」⁵⁴然而，這樣的信念維持不久，當北京政府開始對旬刊《新社會》展開嚴密查察，對瞿施壓時⁵⁵，他卻一改先前較為冷靜的態度，反應憤恨而激烈地寫下〈自殺〉一文，鼓勵青年們趕快自殺⁵⁶。然而，兩文大相逕庭的敘述與前後不一的語調和態度，並非僅如施耐德 (M. E. Шнейдер) 所分析的，反映了青年對舊社會的失望，「在革命知識分子的部分中竭力理解廣大群眾對反帝國主義的與反封建制度的戰爭」⁵⁷如此簡單而已。在這場反外在所有不平等條約或不公平社會條件的戰爭中，瞿需要面對更多正如他在〈「我」〉⁵⁸一文中所呈現的：東與西、新與舊，內與外等方面的教育體制和社會環境下，如何理解、建構與表現自我，以及自我和社會責任之間的關係與衝突。

在〈林德揚君為什麼要自殺呢？〉一文中，瞿秋白引用《圓覺經》來解釋林君自殺的動機，將之歸因於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愛與理想而生嗔心，自殺是一種手段來喚醒昏睡的群眾。儘管如此，此文中，瞿仍對改良社會保持樂觀的信心，說明與勵志的書寫甚於其他文類。但是，到了寫作背景更具切身之痛時，例如〈自殺〉一文，這種手段則被刺激為宣戰敘述。此文不但邀請青年集體自殺，更強調只有自殺方能「在舊宗教，舊制度，舊思想的舊社會裏殺出一條血路，在這暮氣沉沉的舊世界裏放出萬丈光焰。」⁵⁹瞿這般「殺氣騰騰」，不僅是對舊的外在形式下戰書，更是對因循而停滯的內在自我挑戰。這一融合了佛教「入地獄」的積極理想，儒家「殺身成仁」的道德原則，以及俄羅斯無政府主義把自戕做為一種受苦鍛鍊而自強的方法，用以達到自新、更新到重建社會的終極目的。值得注意的是，與〈自殺〉一文刊登在同一專欄內，瞿另作一篇〈唉！還不如……〉，內容描述過去的自己是場噩夢，敘述的同時，心緒卻又擺盪回

⁵⁴ 瞿秋白：〈林德揚君為什麼要自殺呢？〉（原載於《晨報》〔1919年12月3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頁34-39。

⁵⁵ 周永祥：《瞿秋白年譜新編》，頁30。

⁵⁶ 瞿秋白：〈自殺〉（原載於《新社會》第5號〔1919年12月11日〕），《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頁3。

⁵⁷ M. E. Шнейдер, *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Цюй Цю-Бо* (M.: Наука, 1964), С. 19.

⁵⁸ 瞿秋白：《赤都心史》，頁212-213。

⁵⁹ 瞿秋白：〈自殺〉，頁3。

早年佛家消極面的厭世狀態。第一人稱敘述者當時想的「自殺」，是「還不如早早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雙目一瞑，也落得『赤條條來去無牽掛』」⁶⁰。此刻指陳的投湖自盡卻和前文中以自殺殺開血路所展現出的激進且積極的入世觀迥然不同。〈唉！還不如……〉一文暗示自我永久的消亡；〈自殺〉一文則意指置之「死地而後生」，自殺的勇氣乃為新生之濫觴。兩文同時刊登於同報一欄則可成為瞿秋白寫作風格的一個鮮明例證：其作從早期開始，便慣常以兩面矛盾而相互辯證的寫法，揉以佛、儒與俄國無政府主義之概念，以死敵血明志，欲求自新。也就是將「遺書」、「自白書」和「戰書」等多種文類交雜於一處，構成對比而衝擊力強的文字敘述。

一九二〇年初《新社會》不僅沒有停刊，反而增大容量由小型報轉型為小冊子，所以瞿秋白再提筆創作〈社會運動的犧牲者〉時，又恢復冷靜筆風與正向入世觀點。由此可見，瞿秋白早期思想與寫作模式，映照著他內在自我發展和外在家庭背景、政治情勢和社會運動之間互動與變動關係。其自我認同與寫作模式，在道家、佛教、儒家與俄羅斯無政府主義等多面極端中擺盪。避世、厭世、入世與救世並非全然如瞿嚴厲的表面自評，在精神狀態中一直保持著呆滯靜止的二元對立，而是隨情勢變化而處於動態的有機循環，使其性格呈現更多面與多元，心理防衛機制更多重，矛盾的張力和衝突也更複雜深刻。儘管瞿秋白在歐華衝突下，展現出各式思想與行動的排列組合，這一模式並非全然如他自評的分裂或斷裂，而是形成一個比二元化性格更顯動態、更多元的「有機」循環。

在此我們也必須注意，瞿在第一次赴俄之前尚未明瞭馬克思主義的辯證邏輯，已先將佛家「無我」境界與他所認知的儒家最高道德原則——殺「我」，也就是「殺身成仁」做緊密的連結。意即，發佛家救世的心願即是儒家入世精神的展現。這樣一來，瞿在日後一接觸俄羅斯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時，立即將佛、道與儒家思想驗證其中並產生共鳴，所謂的自相矛盾卻合情入理的辯證邏輯就十分清楚了：要使舊中國轉變成新社會，必先犧牲小我，剷除故我，然後無我，方可自新，進而完成大我以弘揚大乘佛教的宗旨。

⁶⁰ 瞿秋白：〈唉！還不如……〉（原載於《新社會》第5號〔1919年12月11日〕，《瞿秋白文集·文學篇》第二卷，頁4。

4. 第一次赴俄：馬克思主義的介入

從瞿秋白早年的《餓鄉紀程》、《赤都心史》與晚年〈多餘的話〉當中，我們可更深一層地探究，瞿認為的儒家的最高道德，佛教思想的積極與消極兩面，道家的物極必反，與他所認知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在某一層面上是十分接近的。這種想法在文本中隨處閃現。信手舉例，他將往新俄這一路的旅程見聞與心得稱之為「餓鄉紀程」，除了在其序中開宗明義地將馬克思主義的「新俄」比擬為儒家求仁得仁者之「餓鄉」⁶¹，更在書中內文明確地將對儒家「求仁」理想的認同與對蘇維埃宗旨「社會革命與世界革命」的認同相互連結起來：

清管異之稱伯夷叔齊的首陽山為餓鄉，——他們實際心理上的要求之實力，勝過他愛吃「周粟」的經濟欲望。——我現在有了我的餓鄉了，——蘇維埃俄國。俄國怎樣沒有吃，沒有穿，……飢，寒……暫且不管，……他始終是世界第一個社會革命的國家，世界革命的中心點，東西文化的接觸地。⁶²

在佛教觀念與馬克思主義的關連之中，瞿秋白又自陳：「我呢？以整頓思想方法入手，真誠的去『人我見』以至於『法我見』，當時已經略略領會得唯實的人生觀及宇宙觀。我成就了我世間的『唯物主義』。」⁶³於是他決然赴俄探險，為「擔一份中國再生時代思想發展的責任」⁶⁴。在第一次赴俄之前，瞿自述他天真地以為「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⁶⁵，其言下之意暗指，若能理解馬克思主義則可祛除「我執」之苦惱，進入「人無我」、「法無我」之境界。但是，赴俄之後他卻明白了馬克思主義的手段有所不同：「為著要消滅『國家』，一定要先組織一時期的新式國家，為著要實現最徹底的民權主義（也就是無所謂民權的社會），一定要先實行無產階級的民權。」⁶⁶雖然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實際上很有道理的邏輯——馬

⁶¹ 瞿秋白：〈緒言〉，《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頁5。

⁶² 同前註，頁31。關於瞿秋白對儒家理想的認同，更詳細的分析可參見夏濟安的研究，Hsia, p. 18。

⁶³ 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頁30-31。

⁶⁴ 同前註，頁31。

⁶⁵ 瞿秋白：〈多餘的話〉，頁704。

⁶⁶ 同前註。

克思主義所謂辯證法」⁶⁷。這種辯證方式和手段與先前業已論證的佛家從消極面上認為萬物皆幻象，乃因眾生為萬物所苦，故要消滅萬物，就讓萬物皆空，得先由認識「自我」(self)入手到「無我」，依此積極推行達到普度眾生的思考模式有著異曲同工的道理。這一認知表面上看似消極，實際行為則是非常激進。對瞿而言，尋找如何讓萬物皆空的方法，與他後來接觸的俄羅斯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唯物論關係重大。誠然，這些連結在熟知其後歷史發展的當世學者眼中看來顯得牽強，但是對瞿一個當時僅二十出頭的青年而言，如他自述，是「自相矛盾」又「很有道理」的。

較為弔詭的是，不論是在未出國前瞿秋白的國學與俄羅斯研究階段，抑或第一次回國後為共產主義代言的時期，儘管在理想境界裏總求無私無我，為黨為國，但是在現實層面中，因「自我」而衍生的相關問題卻始終縈繞在他的文藝或政治思想。更多時候，瞿多面的性格與多重的心理防衛機制又因某一政治大事件的驟然發生，必須在短期內選擇贊同或反對來表達政治立場，而使立即反應與行動產生了激烈的兩極化。表現於外，猶如在二元的對立面來回巨幅擺盪。瞿敏於感受自我，善於觀察自我如何在急遽變化的情勢中表現和展演。在其生平諸多事蹟中，越是在生活中有切身之感，或在政治上有及身的利害關係者，越能體現他晚期所說的這種「二元化」性格。

(二)、「自我」的戰書：從飢餓、「內的要求」到自我實現的自新旅程

在《餓鄉紀程》中，瞿秋白自述：「慘酷的社會，好像嚴厲的算術教授給了我一極難的天文學算題，悶悶的不能解決；我牢鎖在心靈的監獄裏。『內的要求』驅使我，——悲慘的環境，幾乎沒有把我變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之人』，——我決然忍心捨棄老父及兄弟姊妹親友而西去了。」⁶⁸ 瞿的畸零之人與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多餘的人」的心理狀態十分吻合，這也是為什麼他到俄之後不久即能迅速地找到一個堅固的文藝磐石使其繼立。另一方面，正是先前掙扎於避世、厭世、救世與入世的糾結，有感於自殺方能自新，帶著「畸零之人」的心理狀態，使瞿秋白一心「為死而走」⁶⁹，在新俄羅斯內戰尚未完

⁶⁷ 同前註，頁 704-705。

⁶⁸ 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頁 15。

⁶⁹ 同前註，頁 17。

全結束，內政外交狀態皆渾沌不明的時候，毅然地往「餓鄉」走去。

瞿秋白決定第一次往新俄時的動機與心態，如其自述，其中一項動機是因為「內的要求」⁷⁰驅使。中國大陸現存研究多將「內的要求」全盤解釋為瞿要為國為民擔一份責任，過分強調的不外是瞿曾任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或是忠貞的共產黨黨員⁷¹，抑或受害的悲劇英雄⁷²，要不然，就是泛政治化下的精神偶像和導師⁷³。如前所述，一些過於簡單化的分析，可理解為是文革過後瞿獨伊為他「平反」的努力成果⁷⁴，但是卻無法合理地解釋他在〈多餘的話〉所展現出他這一生的心路歷程演變，亦無法清楚地交代「中國之多餘的人」的複雜心理狀態。

瞿秋白第一次赴俄的浪漫與革命層面，已有不少學者撰文專著⁷⁵，本文不再贅述。在此，值得我們更深一層探討的是瞿自謂之「內在要求」，故本文採心理學的動機理論嘗試探討瞿當年的需求與動機。根據馬斯洛(A. H. Maslow, 1908-1970)的需求階層原則(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如附表一)，內在的各種動機從生理到心理，像金字塔階梯的模式一樣，具有不同階層的需求。一般而言，需求又劃分為五個層次，若最低階層需求，如飢餓、口渴與性行為等生理需求不被滿足時，人類就難以顧慮更上一層需求，依此層層類推⁷⁶。儘管在心理學領域內，後進學者根據馬斯洛的動機論提出了批評與修正，主要是

⁷⁰ 同前註，頁14。

⁷¹ 這些千篇一律的稱頌批評數量不少，隨手舉《瞿秋白研究》第一輯為例，陸定一：〈瞿秋白同志生平的報告〉；周揚：〈為大家開闢一條光明的路——紀念瞿秋白同志就義四十五周年〉（分別見頁3-4、5-11）。

⁷² 李奇雅：〈瞿秋白為什麼要寫〈多餘的話〉〉，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輯，頁247-259。

⁷³ 陸定一：〈瞿秋白同志是我的老師〉；陳玉英：〈研究、宣傳瞿秋白，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在瞿秋白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4輯，頁3-4、5-7。

⁷⁴ 瞿獨伊：〈瞿秋白是如何平反的〉，《炎黃春秋》2010年第9期，頁34-37。

⁷⁵ 持此立場研究瞿秋白的專書例子甚多，大部分為中國大陸的學者。例如劉福勤：《瞿秋白：情感·才華·心史》與《從天香樓到羅漢嶺——瞿秋白綜論》；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張秋實：《瞿秋白與共產國際》；陳鐵健：《瞿秋白傳》與《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

⁷⁶ A. H. 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 (1943): 370-96; Stephen Worchel and Wayne Shebilske, *Psychology: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95), pp. 12, 337-338, 440-441.

認為一個層次需求滿足與否並不全然影響追求其他層次的需求滿足，個人行為亦可能受到對「成就」(achievement)、「權力」(power)與「親和」(affiliation)三種需求的成就動機所支配⁷⁷。但是，本文所要強調的不是馬斯洛需求上下階層界線是否牢不可破，而是藉由他所提出這幾個需求的面向做分析，幫助我們更深入理解瞿秋白在不同階段的轉折演變，從本能方面開始，到遭遇外在環境的刺激，他內心的驅力，思考邏輯與其反應行為的表現。

同時，援引馬斯洛的需求階層原則可使讀者簡要地回顧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間的歷史，並且照亮當時在歐美、俄國，甚至是中國學界是如何探索人類存在問題的主要觀點。首當其衝者，如前所述，乃是動盪時代下與社會變遷中個人的「飯碗問題」。其次，當高知識分子從溫飽到自我實現的需求出現問題，成為封建或宗法社會中「多餘的人」，且這些人占絕大多數時，則問題的焦點就如十九世紀俄羅斯現實主義小說的宗旨所示，勢必從個人指向社會。下文中將可詳見，瞿秋白從〈中國之「多餘的人」〉一文開始到〈多餘的話〉，落筆之際念茲在茲的，正是從個人命運指向社會問題。最後，馬斯洛需求階層的形成背景乃基於一種具有全球化前兆（或者是正在全球化徵兆）的普遍現象：貴族（士）階級的崩落、資本主義（商）的興盛，以及馬克思主義（工與農）和法西斯主義（軍）的崛起。因此，如何解決多數的個人需求問題，或者鞏固多數集團的利益，與社會的階級意識密不可分，無一不牽動著國內外的政治發展。這期間內，個人存在的意義與社會問題較單純地落實在物質與實體層面的理性分析，主要考量如何從滿足個人需求走向集體利益。生於這段時期的瞿秋白，全然不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美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mentality)，慣於將問題意識導向極權主義下和戰爭中大規模集體屠殺過後，個人如何在極權的集體中生存下來，或者從當中走出來，所以更抽象而複雜地論述個人內在精神與存在問題的多重假面(masks)、空無(emptiness)與虛無

⁷⁷ 與馬斯洛的動機論相近，可相較或相對者，較顯著的例子有麥克利蘭(David McClelland, 1917-1998)的需求理論(Need Theory)，或稱成就動機理論(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eory)。見其專著 David McClelland, *The Achievement Motive*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3)，及其後來據其論再增修的 *The Achieving Society* (N.J.: Van Nostrand, 1961)；*Power: The Inner Experience* (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s: distributed by Halsted Press, 1975)；*Human Motivation* (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 1985)。這些後來的理論著作主要針對二次大戰後衣食無虞的美國社會，故筆者認為在時空與社會的背景這一方面較馬斯洛理論離瞿秋白更遠。

(nothingness)。

根據一份研究所舉證的資料，以及瞿秋白的自述，他入北京俄文專修館修習俄語的最基本動機，是爲了滿足生理上飢與渴的需求，求一份溫飽的工作⁷⁸。前面已經詳述了瞿從孩童時代「十足的少爺生活」⁷⁹到青少年時期後的「破產家庭生活」，家道中落由奢入儉的經濟狀態使他早熟地體會擁有一份溫飽的工作對他家庭與生活的必要。瞿在《餓鄉紀程》敘述中便不諱言，他學俄文是「爲吃飯的」⁸⁰。〈多餘的話〉中，瞿亦再度地重申「溫飽」對於他早年選擇俄文有重要的關係：

我在母親自殺家庭離散之後，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夠考進北大，研究中國文學，將來做個教員度這一世，甚麼「治國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沒有的，壞在「讀書種子」愛書本子，愛文藝，不能「安分守己的」專心於升官發財。到了北京之後，住在堂兄純白家裏，北大的學膳費也希望他能夠幫助我——他卻沒有這種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試，又沒有考上，結果，是挑選一個既不要學費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專修館去進。這樣，我就開始學俄文了（一九一七夏），當時並不知道俄國已經革命，也不知道俄國文學的偉大意義，不過當作將來謀一碗飯吃的本事罷了。⁸¹

在飢渴與安全感等需求不被滿足的條件下，很少能想到什麼「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在這一點上，瞿秋白的敘述似乎符合馬斯洛所設定的基本生理需求原則。然而，「不能『安分守己的』專心於升官發財」的「讀書種子」的自我剖析，又暗示瞿同時肩負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來自更上層的歸屬感、尊重與自我實現等需求。如前已述，以「餓鄉」爲名，正是因爲瞿自認冒著餓死的精神，認同儒家理想的高貴情操⁸²。字句裏「隨時隨地困難的苦痛」⁸³來自於對國家社會的憂患意識，緊密地連結著中國士大夫「覆巢無完卵」的思想體系。若僅以敘述字面來看，瞿不顧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飢餓」是否被滿足，甚至將此當成一種滿足「歸屬感」、「尊重」與「自我實現」需求的可能，反過來要求

⁷⁸ 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頁 76-77。

⁷⁹ 瞿秋白：〈多餘的話〉，頁 701。

⁸⁰ 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頁 25。

⁸¹ 瞿秋白：〈多餘的話〉，頁 695。

⁸² 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頁 31。

⁸³ 瞿秋白：〈自殺〉，頁 3。

「改變環境：去發展個性，求一個『中國問題』的相當解決，——略盡一分引導中國社會新生路的責任」⁸⁴。「從求一份溫飽」到「發展個性」這樣的改變無疑是劇烈而兩極的，因此許多研究者循著瞿的自敘將其演變直接地指向五四運動⁸⁵，關於此，本文前段業已詳述。在此，更重要的問題則是：當「溫飽」與「飢餓」在瞿的文本與認知中，不再僅屬於生理需求的意義，而是超越這一有形的物質層次且連結無形的精神層面時，那麼馬斯洛的需求階層的界線也不再牢固，更像是錯亂、上下互通，甚至倒置，似已完全不能解釋瞿秋白前往新俄，以及之後其他行動的動機與結果。

在質疑馬斯洛理論是否得以解釋瞿秋白之前，讓我們先來審視並回顧與瞿同時代人的評論和幾位學者的研究。依此，較能看出瞿是如何擺盪於馬斯洛理論的需求上下階層，並且瞭解他幼年到青年時期的「紳士意識」又是如何與中壯年的「無產階級意識」產生對立與差距，使他感到深刻的矛盾。回溯歷史資料以對照上面瞿的自敘時，一些研究發現《晨報》與瞿談妥前往新俄採訪的年薪，是當時一般傳統舊社會知識分子在公家機關或學校謀事所賺取的，多達三至二十七倍有餘⁸⁶。夏濟安與畢克偉的研究皆指出另一面更趨近現實且符合馬斯洛基本需求的瞿秋白⁸⁷。這與另一些研究者所言，瞿放棄畢業後有身分且高薪的外交工作而選擇前往新俄羅斯的自我犧牲⁸⁸，如若對照同是俄文專修館出身卻進入外交工作的耿濟之的生平與家境來看，事實上是有很大的出入⁸⁹。夏與畢的研究合情入理，瞿一方面因家庭在經濟上的迫切所需，所以他才會一接受往新俄羅斯聘任薪資立即回鄉處理母親留下來的債務⁹⁰。一方面也因為他內在急切地想擺脫寄人籬下的寄生生涯，在經濟上獨立，負起家庭長子的責任。

在瞿秋白幾個職涯的重要轉捩點上，如加入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抑

⁸⁴ 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頁 8。

⁸⁵ 趙曉琳：〈五四運動對瞿秋白的影響〉，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 12 輯（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 年），頁 139-147。

⁸⁶ 瞿秋白受雇於《晨報》的年薪為二〇〇〇大洋，是他在無錫當小學老師年薪七十二大洋的二十七倍，比起他在天津鐵路局工作的表姊夫年薪七二〇大洋的近三倍。瞿秋白的薪資參考 Hsia, p. 18；瞿表姊夫的年薪，參閱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頁 19。

⁸⁷ Pickowicz, p. 35.

⁸⁸ 葉楠：《瞿秋白評傳》（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29。

⁸⁹ 鄭振鐸：〈耿濟之先生傳〉（原載於《文藝春秋》1947 年第 4 卷第 4 期），以及〈想起和濟之同在一處的日子〉，《鄭振鐸全集》，第 2 冊，頁 575-584。

⁹⁰ 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頁 17。

或第一次國共分裂時期，優渥的薪資條件與生活待遇一直離不開他的考量。一九二一年瞿經同鄉張太雷介紹在新俄羅斯加入共產黨⁹¹，除了如其所云，深受列寧與共產國際理想的感動。但是，黨員能享有比一般俄羅斯人，甚至是高於當時一般知識分子在中國的物質條件的生活⁹²。在國共合作時期，瞿因力挺鮑羅廷，並與陳獨秀和彭述之對中國革命的意見相左，瞿卻因此在政經層面上比處在中央的彭獲得共產國際更多的支援⁹³。雖然在第一次國共分裂的政治事件上扮演代罪羔羊的角色，史達林卻因此令其成爲在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年間中共駐派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團長，享有許多蘇俄共產黨高級幹部的薪資與福利⁹⁴。然而，這些事例絕非意指瞿會爲了更多或更好的物質條件而悖於儒家道德——「飢餓」的清高與情操，也並非顯示他將因此而違背日後的共產終極理想。對於「革命理想」與「飯碗現實」的差別，王凡西將共產黨員的心態分析得十分透徹：

在革命與不革命或反革命之間，生活問題不會使任何一個革命者作片刻的考慮；但若問題祇關於兩條革命路線之間的抉擇時，生活是否安定就會起相當作用。⁹⁵

面對他認爲的敵人，瞿可以猛烈抨擊，但在中蘇共產黨幾次路線內鬥的轉捩點上，他卻選擇了權力與相對的安定。這正說明他一生追求的，是前往理想的道路上能兼顧基本需求：浪漫的革命與現實的生活調和。然而，在這種狀態無法達成平衡與和諧，或是形成對立且有巨大反差之時，矛盾和痛苦由是而生。這些事證間接地解釋了瞿的行爲動機不但並未擺脫馬斯洛的需求階層，反而恰恰成爲符合其理論的一個例證。

在同時代與同黨的工作人員眼中，永遠「西裝筆挺」、時常「追求物質享受」

⁹¹ 參見瞿秋白：〈記憶中的日期〉，《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七卷，頁724。

⁹² 從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因內戰而多處飢荒與物荒，黨員享有一般俄國家庭沒有的生活待遇，如麵包、茶、奶油並配女僕，享醫療照顧等等福利，詳見《赤都心史》之敘述。例證不少，信手拈例：〈社會生活〉、〈勞動者〉、〈貴族之巢〉（頁132、148、154-156）皆可見。

⁹³ 鄭超麟：〈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第二卷（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8年），頁16。

⁹⁴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香港：周記行，1977年），頁110。據王記敘，當時擔任共黨代表的每月薪資遠超於當共產黨學生的生活費將近三十倍。克林姆林宮中例行的盛宴，奢侈與排場遠勝於白金漢宮的酒會。

⁹⁵ 同前註，頁135。

的瞿秋白，做爲「無產階級」的領袖是飽受質疑的⁹⁶。以瞿秋白做爲原型的小說〈韋護〉，第三人稱敘述者以一種帶有距離而冷靜的角度來觀察描寫韋護的生活與心理，有不少段落中刻畫出一幅從舊中國與新外國（特別指俄羅斯）社會裏出來的知識分子的生活圖案。韋護雖然在政治上主張無產階級生活的重要性，在實際生活裏只要一有錢，過去的中國資產階級與封建制度下的意識便立即戰勝現在的政治主張，建立起舒適而浪漫的物質與精神生活。例如，在敘述韋護往上海找房子的心理與生活習慣時，第三人稱敘述如下：

他爲住處的事真考慮得太多了。他知道，關於這一層他始終都很難邀得一大部分、幾乎是全體人的諒解，就是無論怎樣，他不能生活得太髒了。即使在北京他也生活得較好。所以他必須找一家乾淨的房子，和一個兼作廚子的聽差。但是不知所以然的，他常常爲一些生活得很刻苦的同志們弄得心裏很難受，將金錢花在住房子和吃飯上就花費那末多，仿佛是很慚愧的。他的這並不多的欲望，且是正當的習慣（他自己橫豎這樣肯定），與他一種良心的負咎，也可以說是一種虛榮（因爲他同時也希望把生活糟蹋得更苦些）相戰好久。結局是另一種問題得勝了。就是他必須要有一間較清靜的房間，爲寫文章用。……因爲能寫的人，在他看來，簡直是太少了。……他又買了一些並不是賤價的家具，和好多裝飾品。儼然房子很好，使人疑心這是爲一個講究的太太收拾出來的。⁹⁷

據丁玲的回憶敘述，瞿秋白似乎是認同她對韋護這角色形象的塑造，和心態上矛盾的描寫⁹⁸。儘管小說主角並不能完全等同現實人物，但若將丁玲描述韋護的心理狀態與生活習慣，對照瞿秋白在〈多餘的話〉裏自述的少爺生活，則可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相互佐證和闡明，瞿因出生背景與生命史中階級的精神矛盾：

我母親因爲窮而自殺的時候，家裏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著一個僕婦（積欠了她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⁹⁹

⁹⁶ 可參見鄭超麟：〈我所知道的瞿秋白〉，頁14；陳碧蘭：《早期中共與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憶》（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0年），頁108。

⁹⁷ 丁玲：〈韋護〉，《丁玲全集》，第1冊，頁39。

⁹⁸ 丁玲：〈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頁49。

⁹⁹ 瞿秋白：〈多餘的話〉，頁701。

關於瞿這些小資情調的私生活研究，下文有更多例證。但此處我們已經清楚可見，瞿秋白從不論是進入文壇的第一本遊記與札記，抑或是預備退出政壇，離開人生舞臺的最後一篇手記，瞿秋白自剖的文字始終如一。瞿比他人更能敏銳地觀察自我，瞭解自我的個性與需求，更不願意看到自己被他人「神化」或「英雄化」。有些學者傾向於認為，〈多餘的話〉是一種「假面的內在空無」，除卻面具後仍是另一副面具，同時既偽裝又被偽裝¹⁰⁰。這固然是解讀此文的一種可能說法，然而，我們不禁要問：倘若真無「自我」的實體存在，那麼瞿秋白又何必寫下〈「我」〉一文，汲汲追求「無我、無社會、無世界、無文化」的境界？假設瞿秋白無法感受真實的自我，又何生「多餘的人」的感慨？又何苦臨終前寫下〈多餘的話〉以求一個痛快？

三、政治舞臺的文學首演：遺 / 情書〈中國之「多餘的人」〉與自剖

(一) 屠格涅夫與瞿秋白

關於俄國「多餘的人」之定義、發端與形成，可詳見本文附錄。據筆者考證，中國最早注意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主題“лишние люди”的譯者，應屬田漢¹⁰¹。但是，他卻將之譯為「空人」¹⁰²。田漢對此專有名詞的介紹資訊，從敘述其定義到文藝類型，皆與今日學界的認知有距離¹⁰³。職是，筆者認為，將此專有名詞翻譯為「多餘的人」的瞿秋白才是第一位接近原文意義，並認知、體會這一俄國文藝類型的精神與思想，且將之推廣及應用在中國文壇的翻譯者和作家。這一名詞第一次出現在中文資料裏，是瞿秋白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

¹⁰⁰ 張歷君：〈歷史與劇場——論瞿秋白筆下的「滑稽劇」和「死鬼」意象〉，收入樊善標等編：《墨刻深處：文學·歷史·記憶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321。

¹⁰¹ 田漢：〈俄羅斯文學思潮之一瞥〉（原載於《民鐸雜誌》第6、7期〔1919年5、12月〕），《田漢全集》第十四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30-31。

¹⁰² 同前註。

¹⁰³ 同前註。田漢在文中，為此專有名詞所舉之主要例證，乃是《誰之罪》（*Кто виноват?*, 1846）的作者赫爾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 1812-1870）和書中男主角。並將「空人」階級解釋為，「懷才不至於不能不以放浪送其生為『十九世紀之漂泊者』，俄國最初知識階級之運命，不亦大可哀哉。」但這與本文附錄中所述，今日斯拉夫學界所認知「多餘的人」的典型人物和其性格特徵，有較大出入。

十九日所寫的〈中國之「多餘的人」〉，收錄於《赤都心史》，於一九二四年六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在一九二四年國共第一次正式合作之前，屠格涅夫的作品翻譯成中文的數量遠比其後少了許多。綜合多項考證資料，我發現，除了一九二二年耿濟之翻譯的《父與子》以外，在一九二四年以前中國並沒有任何直接描寫「多餘的人」的屠格涅夫譯著¹⁰⁴。被翻譯的多為屠氏的早期短篇，如〈獵人日記〉、〈初戀〉，還有一些較不為人知的作品，像是《尺素書》（即《通信》，或稱《十五封信》）¹⁰⁵。可以肯定的是，從一九二〇年末期後屠格涅夫在中國的翻譯作品數量逐年急遽升高¹⁰⁶。儘管如此，瞿秋白或他的同時代作家，如郁達夫，早在中譯作品之前，皆已分別透過俄文或日文熟知屠格涅夫。

瞿秋白在〈中國之「多餘的人」〉一文開始便引述屠格涅夫小說《魯定》（現譯《羅亭》）裏的一段文字：

我大概沒有那動人的「心」！那足以得女子之「心」；而僅僅賴一「智」的威權，又不穩固，又無益……不論你生存多久，你只永久尋你自己「心」的暗示，不要盡服從自己的或別人的「智」。你可相信，生活的範圍愈簡愈狹也就愈好。¹⁰⁷

若不回到原文小說脈絡，這段開頭的翻譯字句給予讀者一種沒頭沒尾的感覺，難以深入分析。這段文字源自於小說第十一章羅亭給女主角娜塔莉雅的一封信，也是訣別信。主要原因是平日恃才傲物的羅亭，以動聽雄辯的言語打動、引誘她，卻在她希望能以身相許請羅亭帶她私奔時，他卻惶恐退縮而屈服於現實的壓力而拒絕了她。羅亭因為家道中落，雖然曾在德國留學過，本身卻沒有

¹⁰⁴ 戈寶權：《中外文學因緣——戈寶權比較文學論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陳建華：《二十世紀中俄文學關係》（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汪劍釗：《中俄文字之交》（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年）；戴耘：〈屠格涅夫與中國〉，收入王智量編著：《俄國文學與中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72-119；李定：〈俄國文學翻譯在中國〉，收入王智量編著：《俄國文學與中國》，頁335-338。

¹⁰⁵ 戈寶權：《中外文學因緣——戈寶權比較文學論文集》，頁67。

¹⁰⁶ 李定：〈俄國文學翻譯在中國〉，頁348。

¹⁰⁷ 瞿秋白：〈中國之「多餘的人」〉，頁218。瞿的翻譯文字過時且並非完全如實，筆者參閱原文，重新翻譯如下：「我所缺乏的，大概是一種可以支配人心，就像可以擄獲女人心的特質；而單僅能控制人的頭腦這一項，既不穩定又無益處。……只要您活多久，就跟著您的心走，請別再屈從於自己或別人的理智。」參閱И. С. Тургене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М. Л.: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1963), т. 6, С. 337.

特別技能與謀生能力，僅能以其口才輾轉在地主家中當食客。娜塔莉雅的母親是一位有錢有勢的女地主，羅亭當時正寄居於其門下。表面上他的言語雖然常具遠大抱負並寄望未來，實際上卻甘於這種「飯來張口」的處境，所以力勸女主角與她的母親與屈從於現實之下。但私奔不成的事情被女地主發現後，她便將羅亭掃地出門。所以，臨別前羅亭寫了這封信。原文裏的第一人稱代名詞指的是羅亭自己，而複數第二人稱¹⁰⁸是娜塔莉雅。然而，瞿在引用這段文字作為這篇文章的開頭時，第一人稱與第二人稱意指的卻都是自己。

回到〈中國之「多餘的人」〉一文，瞿在引述羅亭之後緊接著旁徵了墨子的一句話：「聖人不患苦難，而患疾病」¹⁰⁹。此文的寫作背景，是因瞿肺病嚴重¹¹⁰，被送入了高山療養院裏養病時的自述。內容以第一人稱敘述者貫穿，說明自己想起了故國的酣睡殘破，卻疾病纏身而無用武之地，想起了溫暖故鄉的風月絲柳，現實卻活在寒冷的俄羅斯療養院裏進退維谷。瞿遂自傷在兩國裏自己的境地都像個「多餘的人」。有趣的是，這位在俄國的「多餘的人」竟自擬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聖人」。而全篇的要旨，則是瞿將自己這一位「罹病的聖人」更進一步地連結清代詩人黃景仁的名句「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心態。日記敘隨後再一轉，瞿提到自己的心性也曾讓他自以為不同於常人，但理智的結論就是自己和庸眾並無二致。面對故國的戰火，他現實地想「尋一桃源，避此秦火」，但理想又希望自己能回去報效祖國¹¹¹。羅亭信裏寫給年輕的娜塔莉雅的這些話，觸動了他現實與浪漫相敵的「內的不協調」。所以，瞿在文章中提到自己生來是浪漫派，卻為生活折磨成現實派。即將屆滿二十三歲的瞿秋白既擁有娜塔莉雅年輕的浪漫，卻又因自己的身世與經歷，對羅亭因輾轉各地而飽受現實的老成世故有所體會。故作者產生了對屠格涅夫小說中男女主角的雙重認同，瞿自認成為「中國之多餘的人」的主要原因，乃是現實的壓倒理想的、老成的抑制年輕的「自我」。

此文結尾，瞿自敘心境：「我要『心』！我要感覺！我要哭，要慟哭，一

¹⁰⁸ 在俄語語法中，複數第二人稱的用法代表尊稱，表示說話者與聽者的關係還不到親暱的程度。

¹⁰⁹ 瞿秋白：〈中國之「多餘的人」〉，頁 218。《墨子·大取》原作：「聖人惡疾病，不患危難。」

¹¹⁰ 瞿秋白：〈中國之「多餘的人」〉，頁 218；周永祥：《瞿秋白年譜新編》，頁 71。

¹¹¹ 瞿秋白：〈中國之「多餘的人」〉，頁 220。

暢……亦就是一次痛痛快快的親切感受我的現實生活。」¹¹² 這是希冀自己能明白自處的「現實生活」就在簡狹的療養院裏，恰如羅亭所云：「是很好的。」要哭就哭，不必理會世俗「男兒有淚不輕彈」的理性限制與束縛。同時，瞿體會羅亭的告誡、認同羅亭的感想，從心而活，讓自己暢快。瞿引用羅亭的這段文字時自傷身世且自憐境遇，讓第一人稱現實的自己說給第二人稱浪漫的自己聽。但卻又同時使第二人稱浪漫的自己壓倒第一人稱現實的自己，達到安慰與痛快的效果與目的。

相較屠格涅夫的《羅亭》與瞿秋白的〈中國之「多餘的人」〉，我們可以發現，兩者在創作的形式、內容與目的也呈現出不同面貌。不同於前者以小說內的書信體發表，是羅亭試圖讓娜塔莉雅理解自己的選擇，同時是作家透過書信讓讀者明白男主角的性格，後者卻以日記體來抒發自己的心情，顯示更多的是自我剖析和自我療癒，也可看出瞿最初的創作動機並非純粹爲了出版。瞿所用的引文出自羅亭寫給女主角唯一一封自我剖析的情書，直至小說的結局也成爲了他留予女主角與讀者的唯一一封遺書。瞿秋白的日記記錄當下的新俄生活，他書寫認定的真實自我，是性格中浪漫的一面壓倒現實的那一面所抒發出來的情感，是一封自己寫給自己的情書，同時也是一封留予後世的遺書。自憐、自傷、自療／毀與自癒／殺才是此作的最初目的。少了設定的隱性讀者群，所有文字圍繞在「自我」，正說明了「多餘的人」這一主題在中國的發端，到後來翻譯浪潮的興起，其實脫離不了中國作家在五四反傳統的背景爲了掙脫中國士大夫文化裏的集體意識，竭力轉而探索自我存在的干係。弔詭的是，對自我個性的尋求與文藝的表現，最後卻轉化爲集體的宏大政治論述，這也是爲什麼上述之文字、圖像與論述在對照比較下產生強烈衝突與矛盾的原因。這一過程，學者王德威認爲是「體現了個人主體轉進到群眾的主體的過程，也就從個人抒情詩式的表達轉接到所謂『史詩』性的表達」¹¹³。

正如王德威所指，一九三〇年代是個人抒情詩式的文學模式轉進或轉接爲群體史詩性的至要關鍵¹¹⁴。瞿秋白無可倖免地成爲這紅色文藝浪潮中的一員，也將抒情與嘲諷、浪漫與現實、頹廢與激進、無產與資產、紳士與非紳士

¹¹² 同前註。

¹¹³ 王德威：《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頁137。

¹¹⁴ 同前註。

(上等與下等)、個人與群眾、演員與觀眾(表演與觀看)等方面的二元巨大落差和強烈衝突,一股腦兒且自相矛盾地擺/盪在「史詩性」的表現方式中。瞿秋白的雜文集《亂彈》由是而生,呼應了這一「關鍵的年代」,如其序所云:「這個年頭,總有一天什麼都要『亂』。咱們非紳士的『亂』,不但應當發展,而且要『亂』出個道理來。」¹¹⁵

四、政治後臺的演變與拆臺：《亂彈》的戰／降書、悔過書與聲明書——〈小諸葛〉

(一) 後臺：「驚恐者」與崛起的史達林主義

畢克偉業已論證,瞿秋白自一九二三年後第一次從蘇聯返國,到一九二八年抵達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前的這段期間,他如何放棄自己的五四政治觀點,傾力支持共產國際的指令與論點¹¹⁶。加上他留俄且通達俄語的學思背景,在那期間,先後與共產國際及其當時駐中國代表鮑羅庭(M. M. Бородин, 1884-1951)和羅明納茲(B. В. Ломинадзе, 1897-1935)的關係密切,等等內外條件促使瞿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的「八七會議」之後,實際「被拱上」領導階層,逐步地取代了陳獨秀¹¹⁷。瞿這一段追逐權力的過程,正逢列寧死後,蘇共內

¹¹⁵ 瞿秋白：《亂彈》，《瞿秋白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頁254-255。

¹¹⁶ Pickowicz, pp. 56-111.

¹¹⁷ 在還原「瞿秋白如何登上領導階層」的這段歷史過程上，所謂的「托洛斯基反對派」和「史達林當權派」各有不同的詮釋。托派一致認為瞿早有預謀要逼宮竄位，可詳見鄭超麟：〈我所知道的瞿秋白〉與〈再寫八七會議〉，《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第二卷，頁7-10、102-103；陳碧蘭：《我的回憶：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回顧》，頁216-270。當時做為史派的張國燾則認為，從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中正在上海「清共」開始，經「寧漢分裂」到武漢「分共」等一連串事件，共產國際、瞿和其他中共高層已對陳獨秀的領導心生不滿，他確實早有意圖把所有罪過歸咎於陳一人。同時，這也引起了瞿張之間在爭取領導權上產生了矛盾和鬥爭，詳見張國燾：《我的回憶》（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2冊，頁226-287。但是，按照瞿在〈多餘的話〉中自陳，自己有不得已的苦衷：「我根本上不願意自己來代替他們——至少是陳獨秀。」（頁698）。儘管如此，在這一件事情上可以確定的結果是，自瞿在「八七會議」散發給各代表人人一本小冊子《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中國革命中之孟雪維克主義》，當中暗批陳獨秀與彭述之領導的中央後，瞿秋白逐漸地取代陳在黨

部高層鬥爭得最凶猛的時刻。然而，他不曾因為史達林的權力逐步穩固後，「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而改變他舊時的「紳士」派頭和作風。最弔詭的是，正是因為史的上臺，傾全蘇聯之力投注大量金錢、時間和人力資源於「東方的民族解放運動」和「中國革命」一途¹¹⁸，大量地培育以及增強了列寧思想中所謂的「職業革命家」，致使無產階級的理想和資本主義的行動二律背反地同存一個人的精神面貌中，更強化了瞿的「二元人物」說。

從現實層面上來考量，不論是後來的托派或是史派，只要與瞿秋白在工作與生活中熟稔的歷史人物，對於一九二三年第一次從俄返國到一九二八年第二次留俄之前，瞿從步入到處於中共高層期間所過的生活，皆有一個共通的描述，那就是：相對於當時中蘇兩國的百姓而言，瞿在共產國際經濟層面的接濟和照顧之下，絕對稱得上是錦衣玉食¹¹⁹。儘管一九二八年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原就不具總書記身分的中央領導瞿秋白被點名，為過去一年來發生的一連串暴動犧牲了太多共黨同志而負責，轉讓工人階級出身的向忠發擔任中共總書記，但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年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

內的地位，成了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其內文詳見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頁434-559。然而，陳早在一九二七年五月時就已經向共產國際請辭總書記，此一空缺，直至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六屆一中全會在莫斯科召開，才確認由向忠發繼任。這段歷史，可參見唐寶林、陳鐵健：《陳獨秀與瞿秋白》（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年），頁110-245。故誠如瞿在〈多餘的話〉自述，他確實並未擔任過「像外間所傳說的『總書記』」（頁699）。

¹¹⁸ 早在十月革命後，史達林就和大多數的蘇維埃領導人的意見不同。認為在革命後要能持續蘇維埃政權的成就，改善俄國的國際地位，不能只把希望寄託在西歐的革命上，也必須採取一切辦法加強東方的民族解放運動。見尤·瓦·葉梅利亞諾夫著，張捷譯：《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通向權力之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年），頁383。關於蘇聯對中國所付出的各項資源，詳細資料可見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ове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1927-1931* (М.: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 1999)，或可參照其中譯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七卷至第十卷。本書書名，若按俄語字面意義，應翻譯為《聯共（布）、共產國際與蘇維埃在中國的活動（1927-1931）》。

¹¹⁹ 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八年第二次往蘇聯前，關於瞿秋白的私生活，曾任瞿秋白秘書的鄭超麟有詳盡的描述，參見鄭超麟：《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第二卷，頁3-23、133-142；陳碧蘭：《早期中共與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憶》，頁300-316。陳曾為瞿的鄰居。

間或為蘇聯做研究、寫稿和翻譯的瞿，仍是備受禮遇¹²⁰。瞿在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照顧下，生活的經濟層面不會再回到青年時期般貧窮、窘迫。

不同於受惠於列寧時代的中共高層陳獨秀，最終選擇走上與蘇聯決裂的「托派叛徒」路線，瞿秋白即使在臨終時，仍對史達林、共產國際和中共黨中央的當權派保持著一種看似順受的態度。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蘇聯漢學家施耐德在其專書能做出下列結論：瞿秋白終其一生未曾公開地反對蘇聯和共產國際，因為他「總是高度重視蘇聯經驗，對蘇聯人民的生活和努力保持不變的同情。而他所做的全部工作、所從事的革命與文學活動，都致力於增進中蘇兩邊的友誼」¹²¹。除了上述施耐德研究所羅列的自身性格與情感因素之外，過去研究較少提及的是，從史達林時代才開始提供給這些所謂的「代表」或「國際友人」（例如，宋慶齡與陳友仁等）十分優渥的經濟資源¹²²，也應被納入瞿為何做此選擇的考量之一。但是，這並不是說瞿因此而被收買，而是他肇因於性情，主要仍受限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與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教育的薰陶，接受了史達林與共產國際的資助，扮演著類似中國傳統的「食客」、「軍師」與「智囊」角色，或者是像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的「羅亭」一樣，陷入了「拿人手短，吃人嘴軟」的窘境。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身分在莫斯科被賦予的權力象徵和附加價值，確實令當時中共黨內人眼紅。這正是為什麼以王明為代表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

¹²⁰ 曾為瞿秋白學生的盛岳，在盛岳著，奚博銓等譯：《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一書中清楚說明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薪資待遇與福利享受，遠比一般中、俄兩國人民都好，曾任翻譯的他更讓他成為了同學間的「小孟嘗君」（頁52、79-80、90）。學生況且如此，可以想見，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瞿，第二次在俄的生活有多麼無虞。

¹²¹ Шнейдер, С. 216.

¹²² 例如，宋慶齡於一九二七年七月份發表公開聲明與蔣介石決裂後，八月即與陳友仁前往莫斯科，蘇聯提供了一萬盧布（按當時官方匯率來算，約為五千一百二十八美元左右，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數字）的旅費。參見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ове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1927-1931. Часть 1, С. 74*。盧布兌美元的官方匯率，可參照 Елена Осокина, *За фасадом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изобилия"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и рынок в снабжени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годы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1927-1941* (М.: РОССПЭН, 1998), С. 161, 164。此外，據盛岳的回憶，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年間，蘇聯強制實行黨員薪金限定制，一個黨員每月的最高工資是二二五盧布，見盛岳著，奚博銓等譯：《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頁54。由此比例足見蘇聯對這些國際友人的重視。

克」¹²³ 願意依附在米夫 (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иф, 1901-1939) 麾下，纏綿與瞿爭鬥「黨內領導權」和「中國問題專家」的話語權，並竭力取而代之的一個原因。瞿、米夫和王明交手的戰場一路延伸，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到瑞金中華蘇維埃，直到他在長汀被捕正法的這些期間，一連串的內鬥結果，瞿的處境就和十九世紀俄羅斯小說中「多餘的人」一樣，從勝少敗多到一敗塗地。多數中共官方的黨史專家認為，瞿因與米夫的鬥爭失敗，所以被解除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職務，不得不「奉旨回國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¹²⁴，糾正李立三路線的錯誤，是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但事實上，早從中共六大他未能如意當上總書記，到被撤銷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一職等種種史實，盡皆暗示著善於蒐集情資的史達林為了培育屬於自己能夠控制的新興中共領導人¹²⁵，而貶抑，甚至丟棄了列寧時代下崛起的瞿秋白。史達林不可能不知道，瞿曾經或多或少地對托洛斯基在《綱領批判》的立場和意見表達過贊同或同情的評論，才使自己被扣上了「半托洛斯基主義者」的帽子¹²⁶。王凡西更進一步地指出，史恐怕也不喜瞿這種具有自主思想、性格軟弱、立場多變又意志不堅的革命家，才會讓米夫和王明集團在一九二八年過後持續地攻擊和打擊瞿秋白¹²⁷。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期間，第二次前往蘇聯在政治層面上屬於「應被改造」¹²⁸的瞿秋白，是否早已察覺了自己的難堪和處境？我認為，答案是肯定

¹²³ 這些人分別是張琴秋（沈澤民之妻）、張聞天（洛甫）、陳昌浩、陳紹禹（王明）、陳原道、秦邦憲（博古）、朱阿根、朱子純、何克全（凱豐）、何子述、夏曦、蕭特甫、李竹聲、李元杰、孟慶樹（陳紹禹之妻）、沈澤民、盛忠亮（盛岳）、孫濟民、宋泮民、杜作祥（陳昌浩之妻）、王稼祥、王保禮、汪盛荻、王盛榮、王雲程、楊尚昆、殷鑑、袁家庸。見盛岳著，奚博銓等譯：《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頁 222。

¹²⁴ 張秋實：《瞿秋白與共產國際》（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年），頁 302。

¹²⁵ 史達林以擅長蒐集全面的和完整的情報聞名，蘇聯情報員制度就是由他所建立的。可參考尤·瓦·葉梅利亞諾夫著，張捷譯：《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通向權力之路》，頁 391-394。

¹²⁶ 鄭超麟：〈瞿秋白與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第二卷，頁 328-351；王凡西：《雙山回憶錄》，頁 81。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自白，一九三〇年夏天開始，李立三已經形成了「半托洛斯基」的路線，而瞿自忖若在當時的情勢下換成他自己，也會走到那樣的路線，只是沒有李立三那樣的勇氣。（頁 710-711）

¹²⁷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頁 81。除王凡西之外，鄭超麟亦曾描繪瞿在性格上具有這些特點，見鄭超麟：《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第二卷，頁 21。

¹²⁸ 在一九三〇年以前，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內普遍存在一個現象：一旦共產國際發現中國

的。如鄭超麟所述，瞿秋白在政治上是相當敏感的¹²⁹。一九二九年瞿秋白的小弟瞿景白在莫斯科時，也因為一次瞿與米夫、王明集團的鬥爭中，人間蒸發，下落不明¹³⁰。故他對史達林統治下的白色恐怖早有體會。此外，托洛斯基、布哈林和瞿秋白於公於私相互熟識，第二次留蘇期間，瞿或多或少親眼目睹或聽聞史達林是如何與托、布兩人先後鬥爭。加上自己身旁親人就在鬥爭中失蹤的實際經歷，以前述瞿的文弱性格，在外表現噤若寒蟬，並非意外。然而，經過了第二次留俄後，一九三〇年代瞿那些表面演戲的文章和真實內心的糾葛，卻在瞿書寫〈多餘的話〉的同時間，以一連串看似赤裸真誠卻其實欲語還「驚」的密碼結構鋪陳出來。關於這方面，容後詳述。

瞿開始使用別名「斯特拉霍夫」(Страхов)正是在中共六大剛過後¹³¹，此俄文名字的中文意義正是「驚恐者」，強烈地暗示自己當時被批鬥和被當成代罪羔羊後的心理狀態。往後在蘇聯的兩年內，瞿一直使用這個別名。目前所知，瞿秋白一生的別名有將近百個，當中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化名是在一九二八年過後使用¹³²。不難發現，幾個重要的化名或筆名，不管是早期(1923-1927)的「屈維它」(其相關變種的化名有「維」、「維摩」、「維一」、「維它」、「屈維它」和「它兒」等等)和「韋護」，抑或晚期(1928-1936)的「史鐵兒」(相關變化有「史蒂而」、「鐵兒」和「史繼」)或「狄康」等等，常與瞿秋白學經歷的中俄傳統認同，以及內心心境息息相關。早期的屈維它和韋護，如前已述，連結

共產黨內重要的高層人物不受控制或路線錯誤，就會電召他們前往莫斯科，美其名為溝通，事實上是進行思想改造。陳獨秀和李立三都分別接獲此類的通知。

¹²⁹ 鄭超麟：《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第二卷，頁21。

¹³⁰ 據盛岳的說法，一九二九年十月左右，就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一次清黨大會上，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猛烈抨擊瞿秋白的領導，嚴重威脅他在莫斯科共產國際的地位。瞿景白一氣之下，把自己的聯共預備黨員證退給區黨委，自此之後就失蹤了。有一說是瞿景白自殺，詳見盛岳著，奚博銓等譯：《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頁229-230。另有一說，瞿景白是發瘋而死，見王凡西：《雙山回憶錄》，頁81。

¹³¹ 目前筆者手上的資料顯示，瞿秋白最早在官方文件上使用這個化名是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六日的聯共（布）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代表團核心小組會議第三號記錄裏。見“№ 125 Из протокола № 3 заседания Бюро делегации ВКП(б) на VI конгресс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ове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1927-1931*, С. 462。又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第七卷，頁527。

¹³² 苗體君、竇春芳：〈瞿秋白一生使用過多少個別名？〉，《黨史文苑》2011年第3期，頁24-29。

的是瞿對傳統中國佛家的自我認同和期許，接近他理想的精神面貌。然而，晚期的斯特拉霍夫（衍生的兩個筆名分別來自俄、英文兩種拼音 СТР、STR）、史鐵兒和狄康的心態則需回溯至俄語的語境脈絡，強調的是在政治層面的心理狀態和身分認同，傾向於現實條件下的角色扮演。從中、俄文翻譯的角度來看，瞿秋白在一九三〇年代化名為「史鐵兒」，明顯是對崛起的史達林主義意識形態輸誠，並展演自己被改造後的政治認同。史達林 (Сталин) 這一名字的俄語若意譯成中文，乃是「鋼鐵人」。這也正是為什麼奧斯特羅夫斯基 (Н. А. Островский, 1904-1936) 的《鋼鐵是如何煉成的》(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1932) 這部小說，從題名到內容皆符合史達林與其主義，進而成為了其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 的文藝代表作品之一。經史達林時代鍛鍊又回到中國的「史鐵兒」，無非是希望自己能從以前的文弱書生「晉升」為像史達林鋼鐵般的人，從原先意志動搖的「小」資產階級蛻變為「大無畏的」無產階級。

擅長結合政治與文藝並且掌握中、俄文字多層意義的瞿秋白，亦在一九三〇年回中國後取名為「史繼」。除了史（斯）與他的俄語名字斯特拉霍夫的第一個字母同音之外，亦可意味著他將繼續／承史達林的政治路線。瞿更以此為名將信寄往蘇聯友人住處¹³³，間接向史達林體制下無孔不入的監視系統展演他對史達林效忠的政治角色。上述這些俄語的中文名扮演，事實上是敏感的瞿第二次在俄目睹耳聞了，從一九二八下半年起史達林是如何在蘇聯逐步地翦除政治上的異己，例如托洛斯基、季諾維耶夫 (Григорий Зиновьев, 1883-1936)、卡緬涅夫 (Лев Каменев, 1883-1936) 與布哈林等人，以及如何在國民教育體制內開始推廣神化史達林的「文化革命」(культу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後，向即將到來的三十年代史達林主義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提早輸誠的最佳證明。

(二) 拆臺：大小諸葛、多餘的人與「系主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二八年前邁向中共領導階層的路上，是做為政治家（政客？政治明星？）的瞿秋白這一生大放異彩的時刻。在其著作中，不論是

¹³³ 此信寫於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見瞿秋白：〈致郭質生〉，《瞿秋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229。

雜文或是政論文章，皆未曾再提及「多餘的人」¹³⁴。但是，當中國讀者再次透過瞿秋白重新接觸這一專有名詞時，卻已經是瞿在中共第六屆四中全會被踢出黨中央一年餘後，逐漸淡出純政治舞臺的中心，退居政治邊緣結合當時大張旗幟的「革命文學」，轉入文學舞臺的幕後，主持左聯文藝。瞿於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五日寫下一篇標題為〈小諸葛〉的文章，其內容涉及「多餘的人」部分如下：

孟子說：「人之患，在好爲人師。」這就是小諸葛了。可憐的是：「好爲人師」，而又「爲」不了「人師」。這種吊兒郎當的浮萍式的高等無業師爺，已經是夠「英雄」的了，再加上一個歐化的頭銜，自然是新鮮而別緻得很了。中國最近三十年來，總算是「天開洪運」，出產了這麼一層的智識階級的「多餘的人」。¹³⁵

瞿秋白將這篇短文置於他定義的大標題「新英雄」之下，認爲「多餘的人」乃是「括弧以內的『新英雄』和括弧以外的新英雄之間」的「另外一種新英雄」¹³⁶。所謂括弧以內的新英雄分爲兩類，諷刺當時與日本勾結，或者不準備與日抗戰的軍閥司令們。瞿將日本新聞界吹捧的「不可多得之將才」如蔡廷鍇、馬占山歸爲一類¹³⁷，另一類則是中國當權媒體力拱的新英雄，瞿幫他們取了「阿拉司令」、「拉塊司令」與「黨紀先生」等綽號，分別嘲笑並暗指蔣介石，以及其手下的胡立夫與吳稚暉等人¹³⁸。瞿或指名道姓，或含沙射影，將這括弧內的新英雄統稱漢奸，乃「大諸葛」也。至於括弧之外的，則是真正、道地的新英雄，是反對日本與軍閥的工、農與兵。在瞿看來，絕大多數的「小諸葛」是幫「大諸葛」做事的人，既無實際技能，又愛當軍師、師爺，是社會「多餘的人」。用現代邏輯的語言來說，「多餘的人」就是在括弧內外兩個集合之外的另一個

¹³⁴ 介紹俄羅斯文學的專書除外。瞿秋白與蔣光慈在一九二七年曾經一起編著並出版了上、下兩卷的《俄羅斯文學》（上海：創造社），內文清楚地介紹了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多餘的人」的形成背景、文藝思潮和典型人物，並將之歸於「農奴解放與文學」的標題內。但必須注意的是，此書乃是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瞿秋白在第一次旅俄期間所著。見瞿秋白：《俄國文學史及其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31-33。

¹³⁵ 瞿秋白：〈小諸葛〉，《亂彈》，頁317。

¹³⁶ 同前註，頁315。

¹³⁷ 瞿秋白：〈「不可多得之將才」〉，同前註，頁310-313。

¹³⁸ 瞿秋白：〈拉塊司令〉，同前註，頁313-315。

群體的集合。

在「新英雄」這一系列的六篇文章內，值得注意的，不是瞿在字裏行間明顯地不改過往對政敵砲火隆隆之政論風格，而是將人括弧分類後暗地的弦外之音——虛虛實實的讚美、正正反反的批判和真真假假的嘲諷。對於政敵大諸葛們，如前所述，瞿並不直言不諱地攻擊，而是迂迴地以多種嘲笑奚落的語氣、方式和口吻，或利用日方媒體的諛詞，或使用方言取綽號，來弱化甚至反轉這些當權者對特定歷史事件所發布的命令與聲明，將原本正面落實的褒揚重貶為反面虛假的歌功頌德。儘管瞿在論述括弧內的新英雄兩篇短文內表面上一點點名、磨刀霍霍向大諸葛們（軍閥司令們）舞劍，卻又不時顯露他含沙射影，意在沛公（汪精衛、蔣中正與國民黨）的暗批。

瞿秋白這種弦外之音的手法並不令人感到訝異，因為它不僅常出現在瞿對中共黨外敵對勢力的批判文章裏，熟悉他政論風格的人也自然會將此與先前他在中共黨內發表的不少篇政治文章做連結。引瞿在一九二七年中共五大發表的宣傳小冊《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¹³⁹為例，亦行這種明與暗、虛與實，以及假與真交雜之論述，引對方發言人或宣傳者之語加以反駁、嘲弄和批判，進而達到自己政治目的——打擊對方領導者的勢力。這一政論被後來的中共托派人士與一些學者視為，表面上批判彭述之（虛與假），暗地裏全衝著陳獨秀（實與真）而來¹⁴⁰。事實上，這本小冊也確實達到瞿預期的政治效果，讓彭述之與陳獨秀從領導的位置上下臺。儘管如此，當年的瞿對陳敬之如師，小冊中僅找彭述之和蔡和森理論「以正視聽」的論說成分遠大於嘲弄。然而，等到陳獨秀成了托洛斯基派被蘇聯、共產國際和中共掃地出門之後，瞿必須與過去的老師切割，一九三一年寫的〈陳獨秀的「康莊大道」〉¹⁴¹以及〈托洛斯基派和國民黨〉¹⁴²兩篇，堪稱「新英雄」系列之外的箇中經典，對陳挖苦、嘲諷與批判無所不用其極，絲毫不見客氣與手軟。這也正是作為政治人物的瞿秋白，會被一些不清楚（或者太清楚）他政論風格與手法的人認為，人如其文——虛虛實實、正正反反和真真假假——過於複雜的原因之一。然

¹³⁹ 瞿秋白：《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中國革命中之孟雪維克主義》（1927年2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四卷，頁434-559。

¹⁴⁰ 陳碧蘭、王凡西與鄭超麟皆持此見。

¹⁴¹ 瞿秋白：〈陳獨秀的「康莊大道」〉，《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七卷，頁149-153。

¹⁴² 瞿秋白：〈托洛斯基派和國民黨〉，同前註，頁154-169。

而，同時也正因如此，他帶著嘲諷且有弦外之音的政論顯得犀利而有餘味，特別吸引對現況不滿的人。

有別於對大諸葛們的嘲弄，瞿在〈新英雄〉這一系列文章內所頌揚肯定的，是那些被當權者與社會主流指責為「『強橫霸道下流作惡』的披著老虎皮的人」¹⁴³，以及「匪徒」等¹⁴⁴。而這些人，他以俏皮語「丘八」統稱，試圖以另一種稱呼和視角來轉換過去知識分子（秀才）對「兵」的直接反應與刻板印象。瞿將外界歸類的黑暗化光明，責難變稱讚，反面成正面，或者如上所述反之亦然等等手法，當然也與他早期二元化性格的發展息息相關。

然而，在此系列中最為有趣且複雜的，並非是如前所述那樣批判或頌揚括弧內外的新英雄，而是介於兩者間，帶有更多無可奈何與嘲諷語氣的〈小諸葛〉，如同瞿秋白在文中所云：「獨有小諸葛卻有點別緻。」¹⁴⁵大諸葛與丘八在瞿認知的共黨意識形態中壁壘分明，是正反立判的兩個集團（瞿常更進一步地連結階級）。但是，小諸葛卻如瞿將之別於括號內外，說他之為「小」，正在於「他是隨處作人家的小老婆的：或者做括弧以內的『新英雄』的『小』，或者做括弧以外的新英雄的『小』」¹⁴⁶。也就是說，小諸葛在兩個集團中都有，故亦敵亦友、難以歸類。下文我們將可看到，此文透露出來的弦外之音，已非對敵人迂迴的反諷、反駁和反批，更多的成分則是自我懺悔、嘲諷與批判後，必需要與過去的自我切割，並且聲明現狀已經達到自我改造的成果。〈小諸葛〉一文應被視為是一種「敵」「我」難分難捨卻又得分道揚鑣的戰／降書、悔過書和聲明書等綜合文體的再現。

從一九三一年初中共第六屆四中全會過後，瞿秋白的政敵王明在米夫（背後是史達林）的支持下取得中共中央領導權。這一政治發展促使瞿秋白勢必得「改頭換面」，如前業已詳述，他必須告別過去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下「多餘的人」的自我認同，轉向崛起「鋼鐵」的史達林主義與無產階級意識輪誠。從此時開始，瞿不論是對中共黨內發言¹⁴⁷、發表聲明¹⁴⁸，抑或寄往共產國際的

¹⁴³ 瞿秋白：〈老虎皮〉，《亂彈》，頁 318。

¹⁴⁴ 瞿秋白：〈匪徒〉，同前註，頁 320-323。

¹⁴⁵ 瞿秋白：〈小諸葛〉，頁 316。

¹⁴⁶ 同前註，頁 315-316。

¹⁴⁷ 瞿秋白：〈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七卷，頁 121-127。

¹⁴⁸ 瞿秋白：〈聲明書〉，同前註，頁 134-135。

書信¹⁴⁹中，盡皆充滿自我揭發、懺悔、批判、反省，然後再自我改造的字句。舉例如下：

我現在既然認識了自己的錯誤，所以對著四中全會——對於全黨和共產國際揭發這種錯誤——懦弱的腐朽的機會主義：黨應該要把立三路線和調和主義完全肅清！每個共產黨員，要清楚的認識共產國際的路線，要堅決的實行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所以也就要堅決的無情的反對機會主義的一切表現，反對離開共產國際路線的每一步，就算是很小的一步，反對一切種種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因為每一步的離開，每一小兒動搖，是要被敵人利用的！¹⁵⁰

在這些文件可以看出，他與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內鬥的戰場，一路從莫斯科拉回上海，而最終失勢的瞿秋白對於自己能否重回黨中央與共產國際的政治舞臺，如他在〈多餘的話〉中闡明，其實早已失去信心¹⁵¹。儘管如此，鬥爭失敗的瞿，不但無法在此時表達自己內心真正的想法與狀態，相反地，在黨內政敵環伺下為求生存，他在政治上就必須更積極地表態，以退為進——承認自己過去種種的錯誤，並承諾自我現在完全的改造。

另外，瞿秋白試圖將自己思想改造的成果，以一種政論方式展演出來，遂而寫下一篇文章〈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¹⁵²。文中回顧了中國自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成立直至瞿寫作當下，近三十年來的革命情勢發展。瞿援引了不少馬克思與烏梁諾夫¹⁵³的話語，來說明他所認為的中國革命每一階段發展與問題，並強調「無產階級專政」與「黨派立場」才是革命是否成功的指標。然而，如若明白瞿當時所處的政治情勢，細閱此文後不難發現，此文創作目的並非只是單純地紀念馬克思逝世五十週年而已，除了打擊國民黨和中國托洛斯基派，更是展演自己對所謂「正宗」馬克思主義與列寧思想的嫻熟。同時，瞿藉助批判譴責，間接地暗示自己早已拋卻過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惡習——動搖的革命立場、機會主義和調和主義，用字遣詞斬釘截鐵，對自己已經徹底的改造和對

¹⁴⁹ 瞿秋白：〈致共產國際執委和中共中央的信〉，同前註，頁 128-133。

¹⁵⁰ 瞿秋白：〈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頁 125-126。

¹⁵¹ 這一段心路歷程可以參見瞿秋白：〈多餘的話〉，頁 714。

¹⁵² 瞿秋白：〈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同前註，頁 572-598。

¹⁵³ 即列寧。儘管這篇文章迄今未發表，但瞿秋白當時可能為了避免國民黨查抄，同時亦可能是為提醒同黨同志他曾經認識列寧本尊這一事實，故將列寧的真實姓氏 УЛЬЯНОВ 譯為烏梁諾夫以代之。

黨完全的服從，不曾有一絲一毫的懷疑。

因此，上述這些文件、文章（包括〈小諸葛〉一文），單就政治動機而言，是瞿的一種表態；是向政敵王明與其背後代表的史達林主義屈膝的降書，也是向——不僅來自於外在的、現在的，更多是內部的、過去的——「敵人」下戰書，同時也是與過去的自我切割的悔過書和承諾現在的自己改造的聲明書。更有趣的是，瞿不僅只在當時的政治舞臺上展演著自我完全的悔過與徹底的改造，更以文字的方式，將這種對政治現況的自我認同推廣並應用到革命的文學舞臺。

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在《魯迅雜感選集》的〈序言〉¹⁵⁴中，藉分析魯迅雜感的寫作演變來反射映照自己內心轉折的諸多變化。寫作風格依然承繼瞿一貫的方式，將過去「封建制度」（以他的話語來定義）具貶義的詞語，例如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轉變成正面意義的褒獎。而舊制下被認為是光榮士大夫代表的意識和氣質，則被貶抑為反義，又譬如，瞿大力稱讚魯迅「從來沒有擺過諸葛亮的臭架子」¹⁵⁵，也不「做專權的諸葛亮，而叫四萬萬阿斗做名義上的主人。」¹⁵⁶值得注意的是，此序以「從清末到三十年代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在中國的發展」為主軸，來呈現魯迅的雜文如何因時事變遷而改變自己的寫作立場，如何因這些心歷路程而處理他對待同代知識分子的感覺，最終反映在三十年代的他（同時也是瞿秋白自己）所選擇的革命路線與陣營：

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友人，以至於戰士，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鬥，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來的。他終於宣言：「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唯有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¹⁵⁷

魯迅的最後宣言，何嘗不是前述瞿秋白為政治而作的戰書與聲明書另一種表態？從政治舞臺上失勢的瞿秋白，回到文學舞臺找到「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知己，而魯迅在二十年代末期的文學舞臺上被左派團體攻擊得體無完膚之後，

¹⁵⁴ 瞿秋白：〈序言〉，收入魯迅著，瞿秋白編：《魯迅雜感選集》（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9年），頁1-18。

¹⁵⁵ 同前註，頁4。

¹⁵⁶ 同前註，頁3。

¹⁵⁷ 瞿秋白：〈序言〉，同前註，頁15。

能有瞿這樣一位中共前領導人來爲他「革命文學的立場」加持背書，在各自的舞臺上遭受同黨、同派人的攻擊更使兩者相互取暖、惺惺相惜。一些學者業已指出，魯和瞿兩人在文學翻譯上具有高度相似的認同感¹⁵⁸。此外，同屬江浙（這自然引人聯想「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對瞿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處理「江浙同學會」一事上的控訴）¹⁵⁹ 落沒的仕紳階級出身，魯與瞿作雜文、特別是關於時事與政論的文章，皆喜正反顛倒、好挖苦對手的諷刺，故兩人一見如故，並肩作戰，並不令人感到吃驚。

儘管如此，我們不可因此認爲魯迅的所有主張，瞿秋白就全盤接收，反之亦然。魯、瞿在三十年代關係十分密切，除了上述的出身背景、經歷和文風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兩人在所謂「革命大失敗」的年代裏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文學或政治目標認知不盡相同，儘管表面上看似同歸，更值得注意的是實則殊途。兩人文章皆具好鬥而諷刺的風格，但魯迅爲人個性與行文風格遠比起瞿來得直接而果敢，對於他所認爲不能苟同、心服卻又無法坐視不理者，通常「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¹⁶⁰，絕非「同三層樓的小姐〔一樣〕，總那麼客氣」，如布哈林眼中的瞿秋白那般，「說起話來，不是『或是』，就是『也許』、『也難說』……等」¹⁶¹。此外，兩人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黨派身分，如瞿被捕期間所云：「魯迅原非黨員，伊發表作品，完全出於其個人意志，只能算爲同路人。」¹⁶² 這一說法，其意之一雖在保護魯迅，卻也間接地點出自己身不由己的無奈，這種情緒瀰漫於之後的〈多餘的話〉隨處可拾。至少可確定的，就是現已出版的全集來看¹⁶³，魯迅一生未曾寫過如瞿在政治舞臺上那一類的戰／降書、聲明書、懺悔書，或者如其綜合文體般的文章。

在開展更多〈小諸葛〉、多餘的人與〈多餘的話〉之間的糾結之前，必須

¹⁵⁸ 這方面的研究可參閱波茲德聶耶娃著，吳興勇、顏雄譯：《魯迅評傳》（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434；單演義編著：《魯迅與瞿秋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3-14。

¹⁵⁹ 這一段歷史可參考盛岳著，奚博銓等譯：《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

¹⁶⁰ 關於魯迅的這一特性與風格，可參閱拙作：〈瘋狂的前奏曲——初探果戈理與魯迅作品的「黑暗世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2卷第1期（2012年3月），頁165。

¹⁶¹ 瞿秋白：〈多餘的話〉，頁714。

¹⁶² 李克長：〈瞿秋白訪問記〉，《國聞週報》第12卷第26期（1935年7月）。引自劉福勤：《從天香樓到羅漢嶺——瞿秋白綜論》，頁321。

¹⁶³ 就筆者所知，目前可見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行的《魯迅全集》，已有一九五六、一九七三、一九八一和二〇〇五年四個版本。

先深入地討論魯迅與瞿秋白之間的關係並釐清一些觀點。第二次從俄歸國的瞿，儘管在政治上得不到史達林的「聖眷」，但在決定將其志轉向文藝舞臺的同時，卻希望找到一位聲譽卓著且同屬左翼的作家做為踏入文藝界的基石，誠如他自析：「是的，我不能沒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裏，我其實從沒有做過一切鬥爭的先鋒，每次總要先找著某種依傍。」¹⁶⁴ 據茅盾與楊之華的回憶，瞿向來敬慕魯迅，正因如此，他自俄歸國後轉入文化戰線上工作後就主動積極地請茅盾（後託付馮）將魯迅介紹給他¹⁶⁵。兩人一見如故，在此之後往來頻繁，期間瞿夫婦更三次到魯迅家中避難¹⁶⁶。除了私人關係之外，在三十年代初期的文學舞臺上，瞿表面的政治工作是主持左聯、整合革命文藝陣營的戰略，並調和魯迅與其他左派團體之間的衝突，「擴大同路人的路線」¹⁶⁷，就實際的文學操作而言，瞿則借用魯迅之名來發表許多自己的文章，而魯迅也正因翻譯問題需要瞿秋白。兩人相交，在政治與文學的盤算中也互謀其利、各取所需。

日本學者白井澄世更進一步地指出：瞿也藉著為魯撰寫序言之便，欲「將魯迅同高爾基重疊起來」¹⁶⁸。若這種說法成真，王明懷疑瞿的政治動機不是沒有道理。從俄歸來不久的他是否現學現賣、重施故技，欲藉「中國的高爾基」之名來重新奪回黨的領導權，正如一九二七年十月過後史達林開始透過一連串政治手腕，將高爾基納為自己政策下的「模範作家」一樣？這或許可說明了為什麼此序發表不久後，在政治舞臺邊緣而活躍於文藝舞臺的他，會再次遭受中共黨中央嚴厲的批評與打擊。這時候的瞿秋白，以「狄康」為筆名，此乃由俄語 Декан 直接音譯成中文，是「系主任」的意思。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發佈了〈關於狄康同志錯誤的決定〉，認定他六月至八月間，發表多篇抨擊國民黨的文章，犯了「非常嚴重的有系統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¹⁶⁹。瞿先是在《鬥爭》上發表一篇〈我的錯誤〉，並不被接受，五日後

¹⁶⁴ 瞿秋白：〈多餘的話〉，頁 721。

¹⁶⁵ 茅盾：〈回憶秋白烈士〉，收入「憶秋白」編輯小組編：《憶秋白》（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 157-160；楊之華、洪久成整理：《回憶秋白》，頁 125-135。

¹⁶⁶ 這段歷史可參見許廣平：〈魯迅回憶錄·瞿秋白與魯迅〉，收入《憶秋白》，頁 271-280。

¹⁶⁷ 瞿秋白：〈序言〉，收入魯迅著，瞿秋白編：《魯迅雜感選集》，頁 12。

¹⁶⁸ 白井澄世：〈一九三〇年代における瞿秋白の知識人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變容〉，《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60 集（東京：日本中國學會，2008 年），頁 216。

¹⁶⁹ 〈關於狄康同志錯誤的決定〉，《鬥爭》，1933 年 9 月 22 日。

又再撰寫一自我批鬥、懺悔與聲明書〈我對於錯誤的認識〉¹⁷⁰。同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命令瞿離開上海，速去「蘇區」，不允瞿繼續扮演文學舞臺上「系主任」的角色，也不讓他攜帶家眷¹⁷¹。不少學者認為，這些一連串的打擊說明了瞿在黨內的敵人對他早有趕盡殺絕之意，種下日後長征決定留下他的一個原因¹⁷²。魯迅與瞿秋白是否曾想過一種可能性，他們之間親密的友誼是否可能成爲他人眼中的殺機，最後導致〈多餘的話〉的產生？

較令人感到奇怪而困惑的是，白井澄世在分析瞿秋白爲魯迅所寫的〈序言〉時，認爲瞿秋白將「自認爲知識階級，實際上沒有任何實際知識」的「中國式讀書人」，也就是「知識階級的『餘計者』（即『多餘的人』）」歸入體制的自由派、中間派的知識分子，而且是反魯迅的「不革命知識分子」的系譜之中¹⁷³。如此一來矛盾立現，瞿秋白豈不成爲自由派、中間派且反魯迅的不革命知識分子？竊以爲，應釐清上述魯迅與瞿秋白之關係，且理解中共內鬥之來龍去脈，並將〈小諸葛〉與〈多餘的話〉中「文人」一節交相對照，便可看出端倪。兩文部分內容高度相似，足以說明瞿早在第二次自俄歸來後，對自己是否能成爲史達林主義下的無產階級戰士失去信心。

然而〈小諸葛〉一文內最爲有趣之處，並非僅在前述瞿的自我剖析、嘲諷而已，而是在文末他的指桑（自己）罵槐（同志與同時代人），把五四知識分子，特別是一些中共黨人一起拖下「多餘的人」這灘水來：

這些小諸葛，一出學校的門次，就這麼晃來晃去的。壞的呢，挑選了委員主席等類的職業，似乎有些兒像軍師。再不然，三個諸葛亮，湊成一個臭皮匠，辦出一些紅蘿蔔的把戲——裏面是白色，外面是紅色，向大諸葛上上條陳，向小阿斗吹吹牛皮。好些呢，居然要革命，但是又要戀愛，鬧得革命先生和戀愛小姐打了三年零六個月的無頭官司。這些「多餘的人」實在是「多餘的」；上海的戰爭和到處的打仗，更加顯得他們是多餘的了。讀者諸君還有閒工夫的話，請自己去看這些小諸葛的自傳罷，——那就是百

¹⁷⁰ 瞿秋白：〈我對於錯誤的認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七卷，頁647-653。

¹⁷¹ 馮雪峰轉告瞿秋白，這一指示來自黨中央。但據張國燾夫人楊子烈的回憶，是張聞天等人堅持不許楊之華陪同瞿秋白進入「蘇區」。見楊子烈：《張國燾夫人回憶錄》（香港：自聯出版社，1970年），頁262。

¹⁷² 舉例而言，陳鐵健、王彬彬、劉福勤等人的研究，皆持此見。

¹⁷³ 白井澄世：〈一九三〇年代における瞿秋白の知識人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變容〉，頁216。

分之八十的五四式的新文藝，我可沒有功夫奉陪了。¹⁷⁴

若不熟悉瞿第二次重返莫斯科後，在蘇兩年多與黨內同志張國燾，以及「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間鬥爭的恩恩怨怨，恐怕無法得知內文中的諸多暗示究竟意指何人何事。瞿一開始先自我解嘲自己這個「多餘的人」，然後諷刺張國燾，兩人在黨內與共產國際裏都曾經像是個委員主席類的軍師。接著痛批這些依附在「大諸葛」米夫之下的王明、博古與洛甫（綽號蘿蔔）等人，擺出一副紅色共產黨員的臉孔，內心卻向著敵人國民黨白軍，總往蘇共中央投書告狀，或向其他的「小阿斗」同志們與留俄學生吹吹牛皮。這些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留俄學生（包括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間，課堂上常常高喊革命，生活中戀愛傳聞更是鬧得沸沸揚揚（蔣經國與軍閥馮玉祥的女兒馮弗能的戀愛與短暫婚姻自然也算在其內）¹⁷⁵。至於革命先生與戀愛小姐，瞿在字面上雖說是「無頭」，但從歷史與一九二〇年代中後期到一九三〇年以前出版的文學作品裏則能找到不少符合他指責的例證。瞿在此極可能是暗批已經脫離共黨的蔣光慈與他的愛人吳似鴻，但在相同的指控中也牽連了茅盾與秦德君、楊騷與白薇等人¹⁷⁶。由此看來，在瞿秋白「中國之多餘的人」系譜內，吸收更多的恐怕不是來自黨外的自由人、中間人或是第三種人，而是這一群由列寧與史達林培養出來的能言善道、好爭鬥狠或見風轉舵的「職業革命家」。

五、下臺與擂臺：〈多餘的話〉的密碼與綜合文體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共中央與所謂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因蔣介石「第五次圍剿」而進行撤軍，開啓了中共黨史上有名的「長征」，卻也是國民黨黨史上著名的「流竄」。正在此時，身患重病又無作戰經驗的瞿秋白被命令留在蘇區。於是，關乎瞿秋白之死究竟是「誰之罪」，至今爭議不斷，史學界的解釋莫衷一是，而根據不同人的回憶則多多少少有出入，存在些許矛盾。有研究列舉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進而斷言：「王明、博古一夥是有意把瞿

¹⁷⁴ 瞿秋白：〈小諸葛〉，頁 317。

¹⁷⁵ 這些史實，可參見盛岳著，奚博銓等譯：《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頁 110-120。

¹⁷⁶ 關於蔣光慈與吳似鴻、茅盾與秦德君，以及楊騷與白薇等人的革命與戀愛，其中的糾葛官司與他們在當時寫的自傳等等，可詳見王德威：〈革命加戀愛〉，《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臺北：麥田出版，2011年），頁 19-95。

秋白當作包袱甩給敵人，借蔣介石的刀把他殺掉的。」¹⁷⁷ 這種陰謀迫害論為主的論調甚囂塵上，是中國大陸最主流、常見的觀點。更有學者歸咎於博古與其後臺米夫，甚至是大後臺史達林也脫不了干係，所以「瞿秋白不得不走、不得不留與不得不死」¹⁷⁸。還有另一種角度的解讀：「諷刺的是，當時那些被留下來的人被認為比那些長征不知道到何處的人有更大的機會存活下來。」¹⁷⁹ 所以，因瞿之死而責備任何一方沒有意義。另外，亦出現一個有趣的論點，認為瞿秋白之死除了共黨所棄，還得怪他自己孤傲的個性¹⁸⁰。

除了大量研究指陳的政治因素之外，較少研究根據真正的當事人，也就是「三人組」成員之一的李德 (Otto Braun, 1900-1974) 回憶，從軍事戰略問題上來分析瞿秋白的去留問題。李德做為共產國際駐派中共中央的顧問，儘管沒有下達指示的權力，然而當時的總書記博古與實際操作軍事問題的周恩來會習慣性地徵詢他的意見。隨著時間推移，他的權力在這種錯誤印象中被擴充至極大¹⁸¹。他的回憶錄詳細記載了當時中共中央各項軍事策略與部署，其中說明了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兵力遠勝紅軍十倍以上¹⁸²，儘管周恩來竭力主張整個蘇區一起撤退，但是為保主力能突圍全身而退，李德堅持留下游擊隊伍，以備將來主力重返蘇區，同時留下非作戰人員，以免作戰部隊的行動與戰鬥力被這些人妨礙拖累。最後博古調解兩人歧見，將百分之十至二十的蘇區非作戰人員留下，而瞿秋白就在其中¹⁸³。儘管後來項英向李德表達讓重病臥床的瞿留下來，他感到非常惋惜，李德隨即表達他對過去的瞿為共產國際奉獻的敬意，但更指出瞿在江西期間「已經不再起什麼明顯的作用」，「幾乎不太引人注目」¹⁸⁴。

李德的回憶錄珍貴之處，就在於他直接點明了共產國際方面的考量：「引人注目」與「明顯作用」，都是在存亡時刻「保留實力」的戰略上優先考量的

¹⁷⁷ 唐寶林、陳鐵健著：《陳獨秀與瞿秋白》，頁 345。

¹⁷⁸ 王彬彬：〈瞿秋白：不得不走、不得不留與不得不死〉，《並未遠去的背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38-54。

¹⁷⁹ Pickowicz, p. 211.

¹⁸⁰ 胡秋原：〈胡序——瞿秋白論〉，收入姜新立：《瞿秋白的悲劇》（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78 年），胡序頁 2、19。

¹⁸¹ 奧托·布勞恩著，李達六等譯：《中國紀事》（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年），頁 42。

¹⁸² 同前註，頁 50。

¹⁸³ 同前註，頁 94。

¹⁸⁴ 同前註，頁 107。

對象。而先前研究，不論是舉證某些人道聽而來，甚至旁敲側擊的回憶，抑或引用的材料中，都未曾、也無法解釋我認為在當時至為重要的一個狀態形容詞——「多餘的」。身處中共黨內鬥爭白熱化且黨外與國民黨戰爭到了「救亡圖存」的關鍵時刻，油盡燈枯的瞿已經不是一塊「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恐怕曾經待過蘇共、中共和國民黨的瞿自己最明白，「多餘的」在如此高度緊張的鬥爭和戰爭中勢必成爲一種浪費與拖累，這才是蘇共、中共與有「列寧式政黨」之稱的國民黨，都必須遺棄／槍決他的主要原因。而這些革命家、政客，抑或軍閥，不論是王明、博古、周恩來（奇怪的是極少研究將罪魁禍首指向他）、米夫與蔣介石，甚至連瞿秋白自己，這些經過鬥爭或戰爭洗禮過的人全然明白史達林與托洛斯基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纏鬥最凶猛的時刻，曾經說過一句惡名昭彰的話：「等到所有用處被利用殆盡時，就像一顆檸檬一樣可以丟棄。」¹⁸⁵

瞿秋白之死乃誰之罪，間接地牽涉他最後的遺言〈多餘的話〉究竟該如何解讀。誠如上述，史學研究的莫衷一是，迄今文學分析也是眾說紛紜。一般咸認，〈多餘的話〉是瞿從事寫作以來最真摯、最坦白且最動人的文章。這一說法，雖不外乎受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儒家傳統說法影響，但讀者也難免從文本一開始就受到作者的言語制約：「我願意趁這剩餘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¹⁸⁶於是，絕大多數的讀者與研究便隨著作者的自我剖析起舞，聽著他的自我懺悔與聲明進入了他的世界，容易爲這一篇淺白的文字迷惑，輕易地相信了字面上的意義，忽略了當中諸多弦外之音的線索，最後直接進入旁觀者的理性分析與意識形態，然後開始著手對他的指指點點。

過去研究著重將〈多餘的話〉看成是一篇政治文章¹⁸⁷，主要的評論者大多數如那些困滯於解讀瞿秋白之死的文史工作者一樣，旁徵瞿的同時代人如何回憶瞿，以及他們如何看待這一篇遺言，來佐證自己的論調。例如，丁玲將

¹⁸⁵ Bruce Elleman, *Moscow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st Power in China, 1925-30: The Nanchang Uprising and the Birth of the Red Arm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74.

¹⁸⁶ 瞿秋白：〈多餘的話〉，頁 694。

¹⁸⁷ 舉例而言，這一篇文章被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七卷，從編輯方式來看可以明白，在中國大陸學界中這篇遺言的政治性更重於其它面向。

〈多餘的話〉視為瞿一種坦蕩的懺悔，令她「非常難過、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故在她心中，與一般被認為站在持平立場的研究者眼中¹⁸⁸，瞿的遺書是自白書、聲明書與悔過書，毫無疑義。但她特別提出一點要讀者注意：「其中有些話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會被某些思想簡單的人、淺薄的人據為話柄，發生誤解或曲解。」¹⁸⁹言猶在耳，曾經同為瞿的友人（後來成了政敵）陳碧蘭即強烈地表達對丁玲分析的不滿與失望，她認為這篇遺言是徹底的「投降書」，並列舉瞿生平事蹟與遺言中多段明顯表達求生願望的「話柄」，做為此書為瞿向「敵人」投降的證據¹⁹⁰。在瞿同時代人的回憶與評論中，曾和他亦敵亦友的胡秋原對〈多餘的話〉的分析最為有趣，也最與眾不同。他認為這篇遺言是一封情書，「主要是給楊之華看的」，「是一篇政治的散文的葬花詞」。胡更為自己的分析斷言：「楊之華女士如有機會看到我這段話，她會說我是他丈夫之知己罷。」¹⁹¹

綜合以上論點來看，引發諸多爭議的〈多餘的話〉一文具有相當多的層面與層次，可以是遺書、降書、自白書、聲明書、悔過書，甚至是情書，絕非單純的字面意義與語意脈絡能夠完全解釋。現有的研究各憑上述不同觀點，只進行一到兩、三個層面或層次的剖析，全然不能使人滿意。前述業已詳見，瞿的〈多餘的人〉不僅是瞿自我的雙重性質，在政治舞臺演變的階段更具多重、多樣的文學面貌。作為楚囚的瞿在〈多餘的話〉中更揉合了他過去在政治與文學累積的本領，將這種綜合文體發揮到極致，且選擇以一種淺白猶如「談天」¹⁹²的話語作為密碼，將自己的政治意圖與文學主旨層層地包覆並保護起來。不但讓敵人無法發現，更借敵人之手將這遺書當成反面教材的「寶貝」，反覆地在敵人的主流刊物上宣傳、流傳，反倒讓瞿秋白這一個自視為「多餘的人」寫出來的〈多餘的話〉，從國民與共產兩黨眼中的「多餘的」變成「引人注目的」且「起明顯作用」，立即起死回生。至於結果是遺臭萬年，抑或流芳百世，那

¹⁸⁸ 丁玲在此特別提到了陳鐵健的研究與評價。參見丁玲：〈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頁54。

¹⁸⁹ 同前註。

¹⁹⁰ 陳碧蘭：〈附錄：瞿秋白是否值得平反？〉，《早期中共與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憶》，頁527-540。

¹⁹¹ 胡秋原：〈胡序——瞿秋白論〉，胡序頁20。

¹⁹² 瞿秋白：〈多餘的話〉，頁695。

是瞿的一個目標讀者群——「以後的青年」¹⁹³的事情。但是若無法「留取丹心照汗青」，那麼就如同嵇康的〈廣陵散〉，曲終人盡於今絕矣。假設共產黨的編輯群對〈多餘的話〉是否曾被國民黨竄改存疑¹⁹⁴，那麼久為共黨刊物主編的瞿在囚禁之際難道就不曾想過這一可能的後果？那麼該如何迷惑敵人留下這封書信並刊登出去呢？

中國大陸已經有學者發現，要解此文，無法僅看〈多餘的話〉，還得注意他在獄中所題的詩詞，而「未成稿目錄」更是研究瞿秋白的一份很重要的材料，必須將這些聯繫起來思考¹⁹⁵。這一突破，足以肯定。但是他續而提出這樣的方式乃出於兩方面的考量，其一，「目錄可以與〈多餘的話〉等獄中遺作互為印證，而且可以從瞿秋白一生的其他作品，從別人對他的回憶材料中探尋出這些题目的寫作基礎和大致意圖，確證目錄是瞿秋白親擬的」。其次，「目錄提供了瞿秋白傳記的線索，尤其是文化方面的思想和做為文學家的心態，通過考釋可以整理出一些傳記材料，增進對他的認識」¹⁹⁶。這兩方面的考量卻仍擺脫不了為先烈作傳的窠臼，一旦進入史家的評判，就難免更受制於史料、道德、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失去純粹文本、文藝分析的自由。以下，便以〈多餘的話〉文本為主，「未成稿目錄」¹⁹⁷與獄中題詞¹⁹⁸為輔，以及連結過去瞿為「多餘的人」所著的文章，來探究這篇文章多重、多樣的層面與層次。

我一直相信，瞿當時心中所有的盤算和考量遠勝於目前研究所揭露的。過往研究中，在政黨意識形態下分析〈多餘的話〉最為容易、最安全也是最多數，一個俘虜的命運，生者為降、死者為烈，叛徒與烈士的分別就像當時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一樣壁壘分明。然而，瞿以十分聰明的方式在這封遺書中的每一部分（共有七個部分，皆附標題）再三地提醒讀者，不要以為他「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主義的」¹⁹⁹，他「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虛負了某某黨的領袖的聲名²⁰⁰，他「得時時刻刻壓制自己的紳士和遊民式的情感」，但是無產階級

¹⁹³ 同前註，頁 694。

¹⁹⁴ 〈多餘的話：編者按〉，收入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七卷，頁 693。

¹⁹⁵ 劉福勤：《從天香樓到羅漢嶺——瞿秋白綜論》，頁 36。

¹⁹⁶ 同前註。

¹⁹⁷ 可參見瞿秋白：《瞿秋白》，頁 273-274。

¹⁹⁸ 同前註，頁 274-278。

¹⁹⁹ 瞿秋白：〈多餘的話·何必說？〉，頁 694。

²⁰⁰ 瞿秋白：〈多餘的話·歷史的誤會〉，頁 699。

意識在他的內心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²⁰¹。因此，到了現在，他「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²⁰²。他的「政治生命其實早已結束了」²⁰³，瞿繼續自陳，他的根本性格「不但不足以鍛鍊成布爾塞維克的戰士，甚至不配做一個起碼的革命者」²⁰⁴，所以「應當清洗出隊伍的，終究應當清洗出去，而且越（好）（快）越好，更用不著可惜」。他「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已經停止了政治鬥爭，放下了武器」²⁰⁵。

正因上述從〈多餘的話〉每一部分所舉之例，瞿的托派政敵陳碧蘭認為，是寫給國民黨看的，是貪生怕死的行爲，所以這是一封降書²⁰⁶。他的文藝論敵胡秋原則強調，這篇遺言「固然是給社會看，給共黨看的，尤其主要是給楊之華看的」²⁰⁷。而瞿的這種自責表示他早已不滿中共與蘇維埃，是一封「脫黨」聲明書，而目的在於對楊之華的愛情，希望能早日重見她，因為「愛比死還強」，瞿在若干點上與龔自珍「便說尋春爲汝歸」相似，所以這是一封「情書」²⁰⁸。

也因為這些同時代人的評論，過往研究清一色將焦點放在強大他者的讀者身分，從國民黨、共產黨到楊之華，卻未曾注意到這篇〈多餘的話〉既然名爲「多餘的」，要解此密碼應該仰賴瞿秋白自己文章的「互文性」，需與〈中國之多餘的人〉一文相互對照來看。這兩篇遺言皆以第一人稱敘述者貫穿，所有的文字圍繞在「自我」，是情書，但是都是自己寫給自己的，最初目的仍舊是自憐、自傷、自療／毀與自癒／殺。儘管如此，〈多餘的話〉多了政治的面向，是降書，但是對所有一切政治，包括從共產國際、托派、中共到國民黨都求饒和求和，所以一再聲明自己早已不適合政治活動。但在情書、降書與聲明書的層次之中，瞿又以一種個人的、弱者的「我」的姿態，創造了一種最消極、最隱諱的抵抗方式，來挑戰「你們」這些黨派的政治追殺，彷彿控訴著「我的」個人命運至此，難道「你們的」「黨國」都不需要負任何責任嗎？所以，這也是一封戰書，是弱者的戰書，瞿用了弱者十分微弱的反諷口吻來呈現，逃過國

²⁰¹ 瞿秋白：〈多餘的話·脆弱的二元人物〉，頁 702。

²⁰² 瞿秋白：〈多餘的話·我和馬克思主義〉，頁 707。

²⁰³ 瞿秋白：〈多餘的話·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頁 712。

²⁰⁴ 瞿秋白：〈多餘的話·文人〉，頁 715。

²⁰⁵ 瞿秋白：〈多餘的話·告別〉，頁 719。

²⁰⁶ 陳碧蘭：〈附錄：瞿秋白是否值得平反？〉，頁 527-540。

²⁰⁷ 胡秋原：〈胡序——瞿秋白論〉，胡序頁 20。

²⁰⁸ 同前註，胡序頁 19。

民黨審查的法眼：

我寫這些話，決不是要脫卸什麼責任——客觀上我對共產黨或是國民黨的「黨國」應當負什麼責任，我決不推託，也決不能用我主觀上的情緒來加以原諒或者減輕。²⁰⁹

這句話的反義，就是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黨國」應該為「我」負什麼責任，也請不要推託，或用意識形態上的情緒來加以褒揚、安撫或抹黑。瞿在生命即將終結的時刻，以此文重回「我」，以個人抒情詩式的文學模式抵抗「我們」群體史詩的政治狂潮。弱者的力量來自無止盡的自我懺悔，這難道不是一種由「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²¹⁰演變而成的消極戰略？

因此，若以「弱者的主體性」切入來看，則這封遺書就不僅該被視為文學家的瞿秋白一生中寫得最動人的文章，更是他第一次赴俄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之後，從政以來最大膽、最主動的一次政治冒險，而賭注是自己的生命，代價是自己的名聲。瞿以〈多餘的話〉一文，要登上自己建立的文學舞臺，為政治舞臺上的另一個自己辯護，在共產國際、中共和國民黨的歷史強權之下，拿回屬於評價他自己的話語權與領導權。

據胡秋原的分析，瞿對史達林、共產國際與中共不滿，卻不願意在「敵人」國民黨面前罵自己人，故在〈多餘的話〉中以揭露自己的無力感並加以自責，甚至用「洗手不幹了」的行動來表現他的不滿²¹¹。其實比起這一文本分析，更顯明的蛛絲馬跡就藏在瞿秋白最後留下的「未成稿書目」裏。〈憶景白〉²¹²與〈油乾火盡時〉²¹³這兩個標題，恐怕是其中瞿控訴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共最鮮明、也最為關鍵的解密證據。如前所述，一九二九年瞿景白在蘇因不滿瞿秋白在會議上遭受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圍攻，憤而退黨，從此人間蒸發。蘇聯與共產國際在這一事件上從未給瞿任何交代，可以想見家屬的不滿情緒。瞿在最後遺言中婉轉地寫下自請脫黨的聲明時，自然不能不憶起自己兄弟的遭遇。〈油乾火盡時〉則可呼應了史達林惡名昭彰的言語與李德的回憶，瞿秋白像顆已經被榨乾的檸檬，一點用處也沒有，在革命的道路上成爲一個徹底的「多餘

²⁰⁹ 瞿秋白：〈多餘的話〉，頁 699。

²¹⁰ 同前註，頁 701。

²¹¹ 胡秋原：〈胡序——瞿秋白論〉，胡序頁 20。

²¹² 瞿秋白：《瞿秋白》，頁 274。

²¹³ 同前註。

的人」。所以，〈多餘的話〉在最後結語時，列出以下書單：

俄國高爾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薩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魯定》，托爾斯泰的《安娜·卡里寧娜》，中國魯迅的《阿Q正傳》，茅盾的《動搖》，曹雪芹的《紅樓夢》，都很可以再讀一讀。²¹⁴

這些書中男女主角，都具弱者的身形與姿態，都是被主流拋棄的人物，都屬於「多餘的人」脈絡下的角色，而瞿或多或少將自身投射在這些主角的命運中。

胡秋原對瞿上述這段話提供了一個相當有趣的解析，他認為由此可見，瞿「既非叛徒，亦非烈士，而是一位偉大的殉情者，一位男性的林黛玉」²¹⁵。然而，胡以歷史後見之明看見文學家瞿秋白的死亡事實，卻未能點出瞿當時撰寫〈多餘的話〉的同時，其政治考量中亦帶有存活的可能性。高爾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1868-1936)的《四十年》(Сорок, 1925-1936)²¹⁶在瞿被槍決之際尚屬於未完成的作品，瞿是否強烈地暗示著存活的欲望？若他真能因此苟活，那麼他是否如從癡情到無情的賈寶玉，傳說是女媧補天「剩餘的」一塊石頭幻化而成，在人間最終出家，呼應獄中題詞「斬斷塵緣盡六根」²¹⁷的佛家境界？

如果〈多餘的話〉真如胡秋原所云，有些話是要對最親近的人說的，我認為就屬於最後兩句話：

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永別了！²¹⁸

若單就字面解釋，就是瞿秋白希望在臨走前吃到豆腐。江蘇省產黃豆，常州豆腐確實好吃得出名，成為當地人三餐必備的一道料理，這是親屬家人才能明瞭。瞿是不是在死前想起了家鄉？那又為何不是「常州的」而是「中國的」豆腐？如果陳碧蘭認為瞿秋白的遺書只有搖尾乞憐²¹⁹，那麼這最後兩句，也是最重要的兩句，又該作何解釋？竊以為，這是文人瞿秋白在強調自己的「弱者的道德」與「主體性」時，以一種親朋好友才懂得的戲謔兼訕笑語調，對於蔣介石、博古、王明和史達林做為勝利者、當權者與強者的最後一擊，原因如

²¹⁴ 瞿秋白：〈多餘的話〉，頁 723。

²¹⁵ 胡秋原：〈胡序——瞿秋白論〉，胡序頁 20。

²¹⁶ 事實上就是小說《克里摩·薩摩京的生活》的另一個名稱。

²¹⁷ 瞿秋白：《瞿秋白》，頁 277。

²¹⁸ 瞿秋白：〈多餘的話〉，頁 723。

²¹⁹ 陳碧蘭：〈附錄：瞿秋白是否值得平反？〉，頁 527-540。

下。當時與魯迅過從甚密的瞿秋白應該知道²²⁰，同屬江蘇才子的金聖嘆在獄中寫了一封家書，內容如下：「字付大兒看：鹹菜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我無遺憾矣。金聖歎絕筆。」²²¹最後臨刑遺言居然是：「豆腐乾與花生米同嚼，有火腿味。」這樣的言語與心境，是受政治迫害者對於當權者不屑一顧的一種姿態。在文學的舞臺上，瞿秋白仿效了他的江浙前輩，以文學的方式解構了政治舞臺上當紅主角的權力，即便是一種阿Q精神的體現，至少還能像金聖嘆或者阿Q一樣寫／喊一句：「殺頭，至痛也！」²²²／「二十年之後還是一個……」²²³。

至於爲什麼是「中國的」豆腐？或許回到文學的「互文性」中，能找到另一種可能的讀法。密碼是否藏在楊之華的〈豆腐阿姐〉²²⁴內？而在當時，恐怕只有楊之華、丁玲和魯迅夫婦幾位親友才知道這篇小說。在瞿的幫助下，楊之華在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變之後創作了這篇短篇小說，經魯迅修改，刊登於丁玲主編的刊物《北斗》²²⁵。故事梗概是描述一位絲廠女工人，因爲皮膚白嫩，長得標緻所以人稱「豆腐阿姐」。同廠男工人常常喜歡圍著她「打繃」、「吃豆腐」，一次因爲她被幾位同廠男工圍住調戲，而工人阿明解救了她，他們成了夫妻。工廠資本家與日本人暗中勾結，同時剝削廠裏工人，不發薪資。就在日本人進軍上海之後，阿明和豆腐阿姐的孩子都被日軍虐殺，豆腐阿姐就在日軍日夜輪姦之下發瘋，在街道上赤裸狂奔。瞿在遺書的最後，是否挪用了「豆腐阿姐」的形象來形容中國並體現自己的處境？是否借用文中之隱喻——列強侵略、資產階級剝削、同根／黨相殘下的中國猶如豆腐？瞿是否暗示自己的處境如同「豆腐阿姐」；工廠工人猶如同黨的同志，資產階級代表國民黨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都在吃「豆腐阿姐」的豆腐，被列強列霸占盡便宜而無法反抗，受到驚嚇而不能言語？是否暗示自己和中國這般弱者的豆腐，世界第一好

²²⁰ 參見魯迅：〈談金聖嘆〉與〈《論語》一年——藉此又談蕭伯納〉，《南腔北調集》，《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542-543、582-586。

²²¹ 徐珂：《清稗類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5，頁14。筆者感謝王德威教授在課堂上提供金聖嘆這一條線索。

²²² 魯迅：〈《論語》一年——藉此又談蕭伯納〉，頁582。

²²³ 魯迅：〈阿Q正傳〉，《吶喊》，《魯迅全集》第一卷，頁551。

²²⁴ 另一說法指出，此短篇小說爲瞿秋白夫婦共同創造。詳見陳福康、丁言模：《楊之華評傳》（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頁276-277。

²²⁵ 文君：〈豆腐阿姐〉，《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頁293-316。

吃？

上述看來，〈多餘的話〉充滿符碼與戲碼，並不如作者在內文的開頭和結尾強調的那麼「坦白」。值得注意的是，這封遺書全篇緊緊圍繞在瞿秋白一人身上，以第一人稱敘述者開啓自述，在文學筆法上更接近屠格涅夫所著的中篇小說〈多餘人的日記〉。這全然不同於其他蘇共黨員像是布哈林入獄後的「絕筆」，以第三人稱來描述自己，趨近高爾基的小說〈沒用人的一生〉(Жизнь ненуж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1908)。正因為人稱敘述者的不同，瞿的〈多餘的話〉更能夠被視為一齣在文學舞臺上演出的獨角戲臺詞，如他最後所云：「總之，滑稽劇始終是閉幕了。舞臺上空空洞洞的。有什麼留戀也是枉然的了。」²²⁶ 瞿在一開始赤裸地脫去政治身分，以文學作家與劇作家之姿邀請讀者進入他的世界，請君入戲。

六、蓋棺不落幕：結論

隨著中國大陸政治與社會環境的變遷，瞿秋白身後的命運也隨之起落，經歷了進棺、掀棺又蓋棺，反反覆覆，其靈並不安寧。一九四九年後，瞿秋白、瞿景白、瞿堅白兄弟三人被迫認為革命烈士，衣冠合葬於北京八寶山。然而，一九六六年文革運動掀起「抓叛徒」的浪潮，〈多餘的話〉被中共中央定調為「叛徒自白書」。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北京政法學院紅衛兵衝進八寶山，搗毀瞿秋白墓。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通知，為瞿秋白徹底平反，重新修墓，以供後人瞻仰。最有趣的是，隨著大眾媒體的普及，中共領導階層近年來致力於鏡頭前的高幹大眾化、親民化與平民化。二〇一一年為慶祝辛亥革命一百週年與中共建黨九十週年，由常州市委宣傳部邀請導演霍建起與編劇蘇小衛，聘請青春偶像竇驍與董潔分別飾演瞿秋白與楊之華，並將電影名稱取為《秋之白華》，靈感源自於瞿秋白贈與楊之華的一枚定情圖章。由下圖可見，中共新一波浪潮的政治宣傳，已由過去的英雄烈士塑造轉型為少男少女偶像，以及大眾化 Q 版的傳播（見圖五）。瞿在這波浪潮中，顯然地並沒有被眾人遺忘。

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自評自己是個「無足觀」的「文人」，是「中國

²²⁶ 瞿秋白：〈多餘的話〉，頁 722。



圖五

中世紀的殘餘和很壞的『遺產』，也是「詠風弄月的『名士』」，「什麼都懂得一點」，且「優柔寡斷，隨波逐流」²²⁷。處在列強瓜分，軍閥割據與國共內戰的中國，正是因為這樣的性格使得瞿秋白在職業生涯中，從「爲了謀一碗飯吃」到爲了在黨內「調和」與「和和氣氣的過日子」²²⁸，只好像隻「老鴉被捉在樹上做巢」，或像個「戲子」一樣，最後用盡一生精力演一齣他所認爲的「滑稽劇」。劇中他扮演過記者、翻譯者、領導者、大學講師與教授、革命家、宣傳家、文評家、理論家兼教育人民委員，多重身分說明著他情非得已卻又十分頻繁的政治與文藝活動，「演藝生涯」經驗豐富。「文人」很突兀，從「韋護」、「驚恐者」、「史鐵兒」到「系主任」，在瞿秋白的認知中，就像俄國文學的「多餘人」一樣，什麼都懂一點，什麼都半途而廢，永遠忙碌卻又不甘庸庸碌碌。

可以斷定，瞿秋白在五四運動後決定往新俄時已經立下了志向。當時他所要且正在建構的形象、心態與自我認同，並不是一個所謂的無產階級戰士，也不是一位共產主義信徒，這一點在他〈多餘的話〉已經自我剖析過²²⁹。瞿的動

²²⁷ 同前註，頁 712-714。

²²⁸ 同前註，頁 715。

²²⁹ 同前註，頁 695-699。

機並非全如最初《新俄國游記》於一九二二年出版時，文評家王統照（劍三），甚至是一九八九年唐天然所指出的瞿秋白學習俄語與往新俄走去乃因為「他是個人對於家族制，與中國的陳腐而紊亂的社會現象上得來的教訓使他果敢地去情願投身火焰中而不辭」，然後去「勇敢探索中國社會的解放之路」²³⁰。也不可將瞿赴俄的動力全部歸因為「真誠地追求真理的精神」²³¹。

本論文提供了一條相當清晰的「多餘的人」在瞿秋白文章中的發展與演變主軸，緊扣著他的遺書〈多餘的話〉，開展出一個十分豐富且系統化的符碼(包括密碼)和戲碼世界。不論是從早期瞿秋白的自述與他人的回憶，還是瞿秋白所閱讀與認同的文本來看，瞿所立定的志向，不論是從個人的考量，像是釐清紊亂的思想、學好俄國文學或發展個性等理想，抑或是從大環境的層面，例如改變環境、求一個解決中國問題的希望，從他回國後到生命結束，這些志向、理想和希望最終都證明無法實現。瞿秋白是一個批判舊社會封建制度卻又想重振家業、光耀門楣的長子，承繼傳統中國士大夫意識與內化十九世紀俄羅斯「懺悔的貴族」的文藝遺產，所以與在舊社會制度下生活的大眾有著疏遠的距離，回國後在宣揚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社會時，又被摒棄於主流外。本論文闡明了瞿秋白早期性格中各種具二律背反特質的精神現象，為他晚期所做的〈多餘的話〉找到佐證的基礎，也為說明他兩次回國後思想與創作的演變提供一個參考的軌跡。

附錄：「多餘的人」之定義、發端與形成

針對「多餘的人」(лишний человек, 英譯 *superfluous man*) 這一文學專有名詞，儘管俄、中、英、美等國的斯拉夫研究學者各有不同延伸的細分，但在闡述其定義的發展和文學史上的範例歸類，則大致相似。此專有名詞主要根據一八五〇年俄國作家伊凡·屠格涅夫的《多餘人日記》(*Дневник лишнего человека*, 英譯 *The Diary of a Superfluous Man*) 這一中篇小說的名稱，隨後被俄羅斯文藝界沿用，並使之形成概念，推廣普及而成為專有名詞。此詞泛指

²³⁰ 劍三：〈新俄國游記〉(原載於《晨光》第1卷第3號)。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輯，頁29。唐天然：〈最初評論《餓鄉紀程》的精闢文字——讀一九二二年王統照所寫的〈《新俄國游記》一文〉〉，同上書，頁22。唐的引文與王統照原文略有出入。

²³¹ 王鐵仙：《瞿秋白論稿》，頁16。

十九世紀中期前後，「黃金時期」的俄羅斯文學作品中，常出現一種特定的文藝人物類型 (literary type)。

綜合多數研究，所謂「多餘的人」，其社會心理狀態具備下列幾項顯著特徵。第一，「自我」(the self) 不被他人覺知，或是自認為自己與周遭世界格格不入，導致內外皆處於不和諧的狀態，進而否定社會，或者是被社會否定²³²。那些順從於現狀的，遵循於社會或宗教價值觀的文藝角色，通常被視為勝利者。但是，「多餘的人」的特徵之一，乃是敢於與這些勝利者不同，將自己孤立於社會與集體之外，由不適應社會，自我放逐的過程到成為社會與集體的局外人，在文學的與精神的一般意義裏作個失敗者²³³。還有，這些沙俄體制下的「多餘人」文藝類型常常是屬於心性高，敏於自省，思考力強，且多具留學或遊歷西歐（地理上的意義）經驗的知識分子，在精神上遠高於周圍的人們，常能意識自己所承擔的社會責任。言談中流露動人的言論，描繪詩意的過去或未來，卻又經常處於徬徨、懷疑與苦惱的心境中不能自拔，無法勇於活在當下²³⁴。這一類型的男性角色在許多俄國作家的筆下被描繪成雙重而矛盾的性格特質：眼高手低，知行不一。平日口若懸河空懷崇高理想，但遇事則唯唯諾諾怯於付諸實行²³⁵。也因此，「多餘的人」特質常與俄諺「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相連結²³⁶。

據麥克連考證，「多餘的」一詞在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史裏，最早是出現在普希金 (Александр Пушкин, 1799-1837) 為奧涅金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英譯

²³² Hugh McLean, *Handbook of Russian Literature*, ed. Victor Terra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454-55.

²³³ Ellen Chances, "The Superfluous Man in Russian Literature,"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 ed. Neil Cornwel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111; Malcolm V. Jones and Robin Feuer Miller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Classic Russian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93-201;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под ред. В. М. Кожевникова и П. А. Николаева (М.: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87), С. 204;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БСЭ*, 1970-1977, (М.: Новый диск, 2003).

²³⁴ 汪劍釗：《中俄文字之交：俄蘇文學與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年），頁 129-132。

²³⁵ 歐茵西：《新編俄國文學史》（臺北：書林出版社，1993年），頁 145-153。

²³⁶ 俄國諺語 "Большой говорун—плохой работун" 實際上起源於英文諺語 "The greatest talkers are always least doers"。

Eugene Onegin, 1825-1832) 所寫的一個手稿版本裏，但是留有作家塗改並刪除的痕跡，以致於出版的版本裏並沒有出現這一詞²³⁷。而這一文藝類型的概念形成與再現，至少最早可從格里跋耶達夫 (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боедов, 1795-1829) 在《聰明苦》(*Горе от ума*, 英譯 *Wit Works Woe*, 1823-1825) 書中的男主角查茨基 (Чацкий) 和普希金的奧涅金兩角色的性格描繪裏找尋²³⁸。除了上述兩位外，一些研究也歸納了一系列從十九世紀迄今俄羅斯文學作品裏出現「多餘的人」這種文學角色的類型。這些主角，像是岡察洛夫 (Иван Гончаров, 1812-1891) 的奧布洛莫夫 (*Обломов*, 1859)、萊蒙托夫 (Михаил Лермонтов, 1814-1841) 的畢裘林 (Печорин)²³⁹、屠格涅夫 (Иван Тургенев, 1818-1883) 的裘卡杜林 (Чулкатурин)²⁴⁰、羅亭 (*Рудин*, 英譯 *Rudin*, 1855) 和巴札羅夫 (Базаров)²⁴¹、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拉斯科里尼可夫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²⁴²、穆希金公爵 (Князь Мышкин)²⁴³ 和伊凡·卡拉馬助夫 (Иван Карамазов)²⁴⁴、托爾斯泰 (Лев Толстой, 1828-1910) 的安德烈 (Андрей)²⁴⁵ 和安娜·卡列妮娜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英譯 *Anna Karenina*, 1873-1877)，還有契訶夫 (Антон Чехов, 1860-1904) 的拉金 (Рагин)²⁴⁶ 和札伊金 (Зайкин)²⁴⁷。二十世紀俄羅斯作品延續十九世紀「多餘的人」的寫實傳統，最著名的為巴斯契爾納克 (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1890-1960) 的《日瓦哥醫生》(*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英譯 *Doctor Zhivago*, 1957)²⁴⁸。儘管從廣義的角度來看，可將這種「多餘的人」特徵視為一種人類共有的精神現象，在其他國家或文化的文本裏找出雷同的角色類別，但因這一類型的文學角色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文學作品裏出現次數頻繁、集中且描寫深刻，以致出現

²³⁷ McLean, p. 454.

²³⁸ Ibid.

²³⁹ 《當代英雄》(*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英譯 *A Hero of Our Time*, 1839-1841) 的主角。

²⁴⁰ 《多餘人日記》的第一人稱敘述者與男主角。

²⁴¹ 《父與子》(*Отцы и дети*, 英譯 *Fathers and Sons*, 1862) 其中一位主角。

²⁴² 《罪與罰》(*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英譯 *Crime and Punishment*, 1865-1866) 的主角。

²⁴³ 《白癡》(*Идиот*, 英譯 *The Idiot*, 1868) 的主角。

²⁴⁴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英譯 *The Brothers Karamazov*, 1881) 其中一位主角。

²⁴⁵ 《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 英譯 *War and Peace*, 1865-1869) 其中一位主角。

²⁴⁶ 《第六號病房》(*Палата № 6*, 英譯 *Ward Six*, 1892) 的主角。

²⁴⁷ 《多餘的人們》(*Лишние люди*, 英譯 *The Superfluous Men*, 1886) 的主角。

²⁴⁸ Chances, "The Superfluous Man in Russian Literature," pp. 111-122.

在其他國家或文化裏關於刻畫「多餘的人」的零散作品無法與之相抗比擬，或像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傳統與文化遺產一樣，將「多餘的人」視為一個鮮明的發展主軸²⁴⁹。

一些英美研究，將俄羅斯「多餘的人」的文藝類型與歐洲其他國家作家的角色相較、分析並作歸納整理。例如，西班牙作家賽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筆下的唐吉訶德(*Don Quixote de la Mancha*, 1605-1615)，或是德國作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的少年維特(*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1772)，還是英國詩人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詩中的恰爾德·哈洛(*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1812-1818)，皆屬此類。同時還提議，除了文學作品外，不論在現實生活裏，或在歷史中，都可找出屬於這類型的範例，故可將此一文學專有名詞的概念再延伸、歸納和分類，並應用在其他人文領域學科，作為一種文藝人物類型學(literary typology)的方法來研究²⁵⁰。

上述列舉之俄羅斯作品中「多餘的人」的類型，對中國五四時期左翼文學的角色、形象、心態與認同影響甚鉅。然而，問題並非僅在兩國之間文藝交流的輸送與接受問題如此簡單而已。更為錯綜複雜的是，十九世紀俄羅斯作家與西歐浪漫主義作品之間早已先中國文學而盤根糾結，這種影響間接地將中國五四時期的左翼文學作品吸入一個「世界文學」的脈絡裏。舉例而言，普希金與具蘇格蘭血統的萊蒙托夫兩人，不但愛讀拜倫，其真實生活與作品風格更深受他的啓發²⁵¹。至於屠格涅夫的初期作品在修辭、風格、手法、情節和角色等安排，也不難找到歌德的影子²⁵²。此外，屠格涅夫還寫了一篇比較文學的論文，題目為〈哈姆雷特與唐吉訶德〉²⁵³。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自稱受到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的啓發與影響，在自傳

²⁴⁹ Ibid., p.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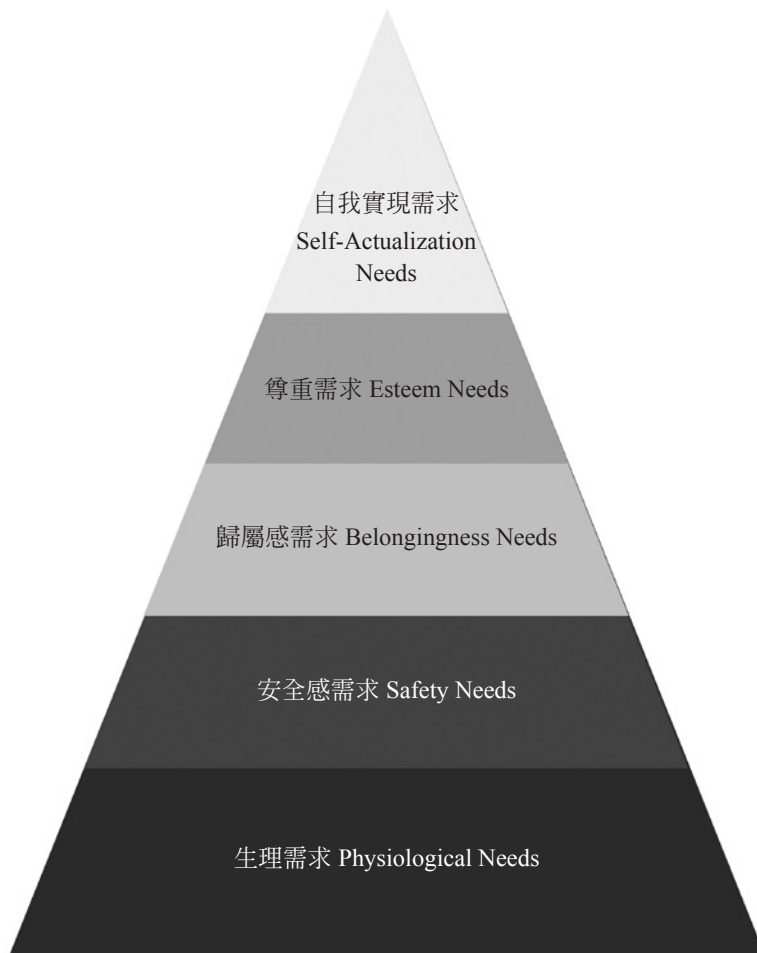
²⁵⁰ 英美斯拉夫研究學者，如 McLean 和 Chances，都主張此論點。

²⁵¹ 關於拜倫對普希金與萊蒙托夫作品的影響，見俄羅斯著名學者日耳曼斯基(В. М. Жирмунский)的專書 *Байрон и Пушкин* (《拜倫與普希金》)(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78)。

²⁵² 見日耳曼斯基另兩本專書 *Гете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俄羅斯文學中的歌德》)(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81) 和 *Немецкий романтизм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мистика* (《德國浪漫主義與當代神秘主義信仰》)(СПб: Аксиома, 1996)。

²⁵³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Гамлет и Дон-Кихо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М.: Наука, 1980), т. 5.

或散文裏寫下對這些俄國文學認同的中國五四左翼文人，像是瞿秋白、蔣光慈、郁達夫、茅盾、郭沫若、巴金等人的閱讀經驗，或是他們作品裏的角色，經常論及西歐作家賽萬提斯、歌德與拜倫，或者唱和呼應，用以連結敘述者及主角的處境和心境。同時，這些五四左翼文人分別透過俄、日、法三種外語認識十九世紀俄國文學與世界文學之「多餘的人」，並依據自己對文學的認識與生命的體認而有不同的翻譯和詮釋，使得這一專有名詞產生「異化」(alienation) 與在地化 (localization) 現象，呈現更多重樣貌。這些翻譯與詮釋，從「畸零之人」、「多餘的人」、「漂泊者」到「零餘者」等等，其實並不相互等同，不可不知就全然概化，筆者將另闢專文析之。



表一 馬斯洛需求階層

「自我」的符碼與戲碼

——論瞿秋白筆下「多餘的人」與〈多餘的話〉

陳相因

本論文以「多餘的人」作為一條明晰的主軸，貫穿瞿秋白一生的創作，並緊扣瞿秋白的遺書〈多餘的話〉，分析它在瞿氏文章中的發展與演變。當中主要論點亦在闡明瞿秋白性格內具二律悖反特質的精神現象，為後來他所做的〈多餘的話〉提供可相互佐證的基礎，並解析瞿秋白文章內多層次的自我符碼與戲碼。

本論文藉由爬梳評論，並綜合分析中、俄、英、日四方之過往文獻，追源溯本。本文前半部分，著重於系統地梳理俄國文學「多餘的人」的傳統與內涵，再以具體的中俄文本進行比較論證，並討論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瞿秋白，在第一次赴俄時如何在此脈絡下轉化俄國文學作品的原意，經創作新意抒發去國懷鄉的心情。同時，以中、俄文本來驗證「多餘的人」這一專有名詞的定義與範圍，介紹相關的文藝範疇與類型，並具體地比較分析瞿秋白的日記和羅亭的書信，說明這一主題如何被瞿秋白認同、內化、轉化，成為其抒情表達。後半部份，則聚焦解析第二次赴俄後的瞿秋白，如何在崛起的史達林主義中被迫以中、俄的文藝技巧與論述修辭，置入諸多符碼來多層次地遮掩／彰顯其政治動機與目的，展演一個矛盾、豐富且多面貌的自我。論文的最後部分針對遺書〈多餘的話〉進行剖析，融合多方看法，企圖以多種角度來詳解此篇具有多層次符碼與戲碼的文本帶來的問題與爭議。

關鍵詞：多餘的人 〈多餘的話〉 瞿秋白 屠格涅夫 羅亭 魯迅

Symbolizing and Dramatizing “the Self”: “Superfluous Man” and “Superfluous Words” in the Prose of Qu Qiubai

CHEN Hsiang-yi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eme of “superfluous men” in Qu Qiubai’s oeuvre, particularly in his posthumous work “Superfluous Words.” It argues that the “antinomies” of Qu’s inner self are embedded in his “Superfluous Words,” and that symbolizing and dramatizing the self ar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his works.

It includ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Chinese, Russian, English and Japanese studies of Qu Qiubai to trace the Russian origin of the term “superfluous men,” enumerates its literary types in world literature, and investigates its influence on Qu’s prose and political essays. It shows how Qu employs the term, types and theme as a simile, metaphor, or instrument in his works—especially in his “Chinese Superfluous Man,” “Little Zhuge” (Wise Advisor), and “Superfluous Words”—in order to illuminate, conceal, symbolize, or occasionally dramatize his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in different stages.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reveals how Qu was influenced by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in his first visit to Russia, demonstrating that Qu identifies himself with Turgenev’s protagonists—Qu appears as a superfluous hero in his diar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Qu’s “Chinese Superfluous Man” and Turgenev’s *Rudin* is conducted in light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the author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turns to the impact that rising Stalinism had on Qu’s political career in his second visit to Moscow, analysing how Qu was forced to apply the term, category and theme of “superfluous man.” In this period, Qu’s works are comprised of a plurality of codes, and Qu portrays himself in different personae for different purposes. Based on the ideas of the “target reader” and “intertextuality” in Qu’s last works, the final section of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ettle the disputes surrounding Qu’s “Superfluous Words.”

Keywords: Chinese and Russi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uperfluous man
“Superfluous Words” Qu Qiubai Turgenev *Rudin* Stalin Lu Xun

徵引書目

- 丁玲：《丁玲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 于良華：〈瞿秋白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和傳播〉，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輯，常州：瞿秋白紀念館，1989年。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
- 戈寶權：《中外文學因緣——戈寶權比較文學論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
- 文君：〈豆腐阿姐〉，《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頁293-316。
-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香港：周記行，1977年。
- 王彬彬：《並未遠去的背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
- 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臺北：麥田出版，2011年。
- _____：《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
- 王關興：〈瞿秋白和第三國際〉，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2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0年。
- 王鐵仙：《瞿秋白論稿》，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年。
- 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 史洪：《革命先驅瞿秋白》，北京：中國勞動出版社，1990年。
- 考尤·瓦·葉梅利亞諾夫著，張捷譯：《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通向權力之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年。
- 司馬璐：《瞿秋白傳》，香港：自聯出版社，1962年。
- 田漢：《田漢全集》，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1年。
- 朱淨之：〈中國新文化的一胚胎——瞿秋白的社會史觀〉，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輯，常州：瞿秋白紀念館，1989年。
- 吳之光：〈常州瞿氏世系源流考〉，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2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0年。
- _____：〈瞿母之死因及其它——瞿秋白家世探討之二——〉，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輯，常州：瞿秋白紀念館，1989年。
- 吳騰鳳：〈共同的志向深厚的友誼——瞿秋白與蔣光慈的友情概述〉，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2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0年。
- 李奇雅：〈瞿秋白為什麼要寫〈多餘的話〉〉，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輯，常州：瞿秋白紀念館，1989年。
- 李定：〈俄國文學翻譯在中國〉，收入智量等：《俄國文學與中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
- 汪誠意：〈瞿秋白的思想演變與俄蘇文學〉，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輯，常州：瞿秋白紀念館，1989年。
- 汪劍釗：《中俄文字之交：俄蘇文學與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年。

- 周永祥：〈瞿秋白與中蘇文化〉，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2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0年。
- _____：《瞿秋白年譜新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年。
- 周揚：〈爲大家開闢一條光明的路——紀念瞿秋白同志就義四十五周年〉，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輯，常州：瞿秋白紀念館，1989年。
- 波茲德聶耶娃著，吳興勇、顏雄譯：《魯迅評傳》，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 季甄馥：〈瞿秋白與普列漢諾夫〉，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3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年。
- 邵玉健：〈瞿秋白與常州名人考略〉，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2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0年。
- 胡秋原：〈胡序——瞿秋白論〉，收入姜新立：《瞿秋白的悲劇》，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78年。
- 苗體君、竇春芳：〈瞿秋白一生使用過多少個別名？〉，《黨史文苑》，2011年第3期，頁24-29。
- 茅盾：〈回憶秋白烈士〉，「憶秋白」編輯小組編：《憶秋白》，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唐天然：〈最初評論《餓鄉紀程》的精闢文字——讀一九二二年王統照所寫的《新俄國游記》一文〉，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輯，常州：瞿秋白紀念館，1989年。
- 唐寶林、陳鐵建：《陳獨秀與瞿秋白》，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年。
- 孫叔、湯淑敏編：《瞿秋白與他的同時代人》，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徐珂：《清稗類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張秋實：《瞿秋白與共產國際》，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
- 張國燾：《我的回憶》，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年。
- 張歷君：〈歷史與劇場——論瞿秋白筆下的「滑稽劇」和「死鬼」意象〉，樊善標等編：《墨刻深處：文學·歷史·記憶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年。
- 盛岳著，奚博銓等譯：《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
- 許廣平：〈魯迅回憶錄·瞿秋白與魯迅〉，「憶秋白」編輯小組編：《憶秋白》，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陳玉英：〈研究、宣傳瞿秋白，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在瞿秋白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4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年。
- 陳建華：《二十世紀中俄文學關係》，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 陳相因：〈瘋狂的前奏曲——初探果戈理與魯迅作品的「黑暗世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2卷第1期，2012年3月，頁151-175。
- 陳弼：〈秋白同志，我們永遠懷念您〉，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輯，常州：瞿秋白紀念館，1989年。
- 陳碧蘭：《早期中共與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憶》，香港：天地圖書，2010年。
- _____：《我的回憶：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回顧》，香港：十月書屋，1994年。

- 陳鐵健：《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 _____：《瞿秋白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 陸定一：〈瞿秋白同志生平的報告〉，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輯，常州：瞿秋白紀念館，1989年。
- _____：〈瞿秋白同志是我的老師〉，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4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年。
- 單演義：《魯迅與瞿秋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 曾樂山：〈瞿秋白在哲學上的傑出貢獻〉，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3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年。
- 奧托·布萊恩著，李達六等譯：《中國紀事》，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
- 楊子烈：《張國燾夫人回憶錄》，香港：自聯出版社，1970年。
- 楊之華、洪久成編：《回憶秋白》，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 _____：〈憶秋白〉，《瞿秋白自傳》，淮陰：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
- 溫濟澤：〈我怎樣研究起瞿秋白〉，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2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0年。
- 葉孟魁：〈瞿秋白與張太雷〉，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輯，常州：瞿秋白紀念館，1989年。
- 葉楠：〈瞿秋白對語言理論的貢獻〉，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2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0年。
- _____：《瞿秋白評傳》，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1991年。
- 趙庚林：〈秋白精神與紀念文化〉，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3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年。
- 趙曉琳：〈五四運動對瞿秋白的影響〉，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2輯，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年。
- 劉小中：〈瞿秋白和郭沫若的交往和友誼〉，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7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年。
- 劉自省：〈瞿秋白同志嚴以律己的自我解剖精神〉，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2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0年。
- 劉福勤：《從天香樓到羅漢嶺——瞿秋白綜論》，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
- _____：《瞿秋白：情感·才華·心史》，濟南：濟南出版社，2001年。
- 劍三：〈新俄國游記〉，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輯，常州：瞿秋白紀念館，1989年。
- 歐茵西：《新編俄國文學史》，臺北：書林出版社，1993年。
- 潘涵英：〈請鄧小平同志題寫「瞿秋白紀念館」〉，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輯，常州：瞿秋白紀念館，1989年。
- 鄭振鐸：《鄭振鐸全集》，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
- 鄭超麟：《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8年。

- 〈關於狄康同志錯誤的決定〉，《鬥爭》，1933年9月22日。
- 魯迅：《吶喊》，《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南腔北調集》，《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錢聽濤：〈瞿秋白入黨時間考析〉，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4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年。
- 戴耘：〈屠格涅夫與中國〉，收入智量等：《俄國文學與中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
- 韓斌生：〈瞿秋白與陳獨秀〉，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2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0年。
- ：《文人瞿秋白》，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瞿秋白：〈序言〉，收入魯迅著，瞿秋白編：《魯迅雜感選集》，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9年。
- ：〈浣溪沙·瞿秋白獄中詩詞和題詞〉，《從天香樓到羅漢嶺——瞿秋白綜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
- ：《俄國文學史及其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 ：《亂彈及其他》，香港：波文書局，1973年。
- ：《瞿秋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 ：《亂彈》，《瞿秋白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
- ：《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
- ：《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
- ：《瞿秋白文集·文學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1989年。
-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1996年。
- 瞿獨伊：〈尋覓雙親的足跡〉，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1輯，常州：瞿秋白紀念館，1989年。
- ：〈瞿秋白是如何平反的〉，《炎黃春秋》2010年第9期，頁34-37。
- 白井橙世：〈一九三〇年代における瞿秋白の知識人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變容〉，《日本中國學會報》第60集，日本中國學會，2008年。
- Chances, Ellen. "The Superfluous Man in Russian Literature."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 ed. Neil Cornwel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Elleman, Bruce. *Moscow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st Power in China, 1925-30: The Nanchang Uprising and the Birth of the Red Ar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Furth, Charlotte. "Intellectual Change: from the Reform Movement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1895-192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ed. J. K. Fairbank and Denis Twitchett, 15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Galik, Marian. "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II. Young Ch'ü Ch'iu-pai (1915-

- 1922)."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2 (1976): 90-95.
- Hsia, Tsi-an.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8.
- Jones, Malcolm V.; Robin Feuer Miller,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Classic Russian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Malcolm V. Jones and Robin Feuer Miller,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Classic Russian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Maslow, A. H.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 (1943): 370-396.
- McClelland, David. *Human Motivation*. 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 1985.
- _____. *Power: The Inner Experience*. 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s: distributed by Halsted Press, 1975.
- _____. *The Achievement Motive*.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3.
- _____. *The Achieving Society*. N.J.: Van Nostrand, 1961.
- McLean, Hugh. *Handbook of Russian Literature*. ed. Victor Terra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Pickowicz, Paul G.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Ch'ü Ch'iu-p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Worchel, Stephen; Wayne Shebilske. *Psychology: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95.
- Большой советск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БСЭ, 1970-1977)*, М.: Новый диск, 2003.
-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Байрон и Пушкин*. Л.: Наука. 1978.
- _____. *Гете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Л.: Наука. 1981.
- _____. *Немецкий романтизм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мистика*. СПб: Аxiма. 1996.
- Квитко Д.Ю. *Философия Толстого*. 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1928.
-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ове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1927-1931*, С. 462 °
- Кондрашова Л.И., Суровцева М.Е.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в России: Лев Толстой и Лао-цзы." *Пятые Торчин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 Философия, религ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стран Востока 6-9 Февраля 2008*. СПб: СПбГУ, 2009, С. 485-491.
-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под ред. В.М. Кожевникова и П.А. Николаева М: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87.
- Нобуюки Накамото (中本信幸) "ТолстойЛао-Цзы: Преемникиидей Л.Н. Толстого в Японии." *Печатный Двор 2001-2010.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ДВОРАН, 2012, С. 144-151.
- Осокина, Е.А. *За фасадом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изобилия".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и рынок в снабжени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годы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1927-1941*. М.: РОССПЭН, 1998.
- Тургенев, И.С. 'Гамлет и Дон-Кихо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Т. 5. М.: Наука, 1980.

Шнейдер, М.Е. *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Цюй Цю-Бо*, М.: Наука, 1964, С. 19.